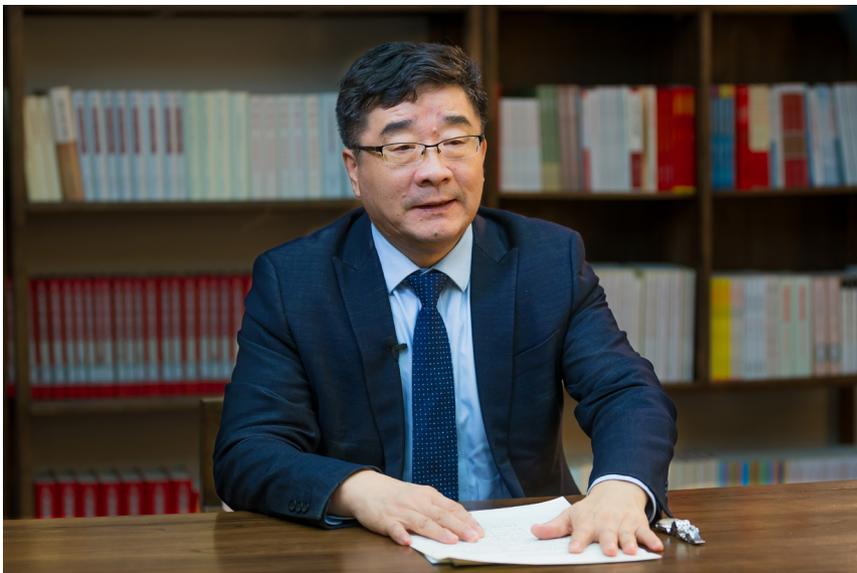


教育是门大学问、红色基因育出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校长访谈录



刘伟

刘伟，男，汉族，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商丘，祖籍山东蒙阴，中国共产党党员，经济学博士，一级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974年11月至1978年2月在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1978年春（77级）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4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2002年至2015年11月，历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2015年11月至2022年08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编者按：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烽火中诞生，骨子里传承着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才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人大带着“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光荣传统，一路走来，形成了三大特色——“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从成就卓越的专家学者到闻名遐迩的企业家，从政绩斐然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到卓有建树的经济、新闻、法律、文学、文艺和科技工作者等，人大桃李芬芳、星驰天下，80多年来培养了30多万名共和国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领军人才。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上，人大如何继承优良传统？续写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频共振的精彩华章？《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人大

寻找新时代中国高校的办学育人之道

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烽火中诞生，骨子里传承着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才是其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人大带着“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光荣传统，一路走来，形成了三大特色——“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

从建校初期的“八大系”到孕育孵化一大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专业；从新中国法学、新闻学的第一位博士和第一位外籍文科博士，到囊括“第一本中共党史教材”“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通史”“第一套哲学专业教材”等在内的众多“第一”，人大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

从成就卓越的专家学者到闻名遐迩的企

业家，从政绩斐然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到卓有建树的经济、新闻、法律、文学、文艺和科技工作者等，人大桃李芬芳、星驰天下，80多年来培养了30多万名共和国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领军人才。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您怎么看高校校长的职责和使命？一流大学的校长究竟应该是当教育家多一些，还是当学问家多一些？

刘伟：我觉得这个不好机械地去分开。所谓“大学”，她就是培养人的一个“圣殿”。作为校长，最基本的使命和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立德树人。教书育人，培养人，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学问、知识、智慧、思想，尤其是价值观、道德情操，浑然一体的培养过程。所谓“政治家”，就是要解决学校办学的方向的问题，解决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为党育才的问题。

作为教育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首先解决为谁来培养人，进而再解决怎样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所以，我想从这个目标的要求来说，大学校长应当是教育家、政治家、学问家各方面的统一。

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创办的新型正规大学，从“战火中的大学”发展壮大为“新国家的新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刘伟：人民大学前身可以追溯到1937年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党创办的陕北公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成立时，最初有八个系，就是为共和国建设、为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培养相应的人才，特别是经济、法律、文化建设的需要而设立的。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任校长刘伟(左二)陪同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任校长刘伟(右三)陪同

这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我们现在培养的毕业生累计有三十几万，形成了“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的高地三大办学特色；“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发展体系。

在“双一流”建设中，人民大学的14个学科入选了“双一流”建设的第一期计划。在第四轮的全国组织的学科评

估当中，我们有9个学科获评A+，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像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统计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学科，应当说长期以来，人民大学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也有相当的国际影响。这些年，人民大学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有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在逐渐培育。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一角

记者：您觉得人大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刘伟：人大的学生、人大的老师，的确有着浓厚的革命传统底蕴，这是她的红色传承的基因。人大的学生，他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志向，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

记者：要真正跻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最关键之处在哪里？

刘伟：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简单地说就是顶天立地。立地，就是站在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面向中国实际，服务中国的现代化。顶天，就是世界水平，在解决科学问题方面发现问题、发现规律。人文社会科学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比较，除了发现真理、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之外，还有更多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在批判基础上的担当。

记者：就是说，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永远在路上？

刘伟：没错，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学的老师、大学的建设者，我们的受教育者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历史时代的机遇、挑战，要把握住。在这样的一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做的工作可能

都挺微不足道的，我说句老实话，你回过头看，真正伟大的事情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渺小的事情堆积起来的一个洪流。

记者：您对未来的新赶考之路是充满信心的？

刘伟：对，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近。但是也有一条，越是距离这个目标近，遇到的阻力、困难、斗争越复杂，越需要我们把握住机会，做艰苦的努力，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

记者：人民大学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方面，有哪些新的安排？

刘伟：首先就是要从规模布局上，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所以我想，首先是培养人的质量和结构，特别是学科结构的建设，从本科到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按照教育的规律，按照时代发展、社会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努力地在调整我们的学科建设的结构。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凸显研究型大学的特点，研究型教育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要进一步地上

升。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强立德树人，在道德情操和修养各个方面，在思想价值、信仰方面，要给学生积极健康的引导，向着光明、美好这方面去展示和引导。

记者：育人这篇大文章的最关键之处是什么？最看重人的什么？

刘伟：从各个方面一定要树立正气，要有理想，要有正义感，有正确的追求，形成一个健康的、坚定的信仰，必须有志气、底气、骨气。这是做人最要紧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你即使哪些方面知识不够，你将来可以再去学，前途无量。一个人把自己的成长，如果和民族的事业、国家社会发展、对别人的有用性，和这个贡献割裂开、脱离开，这个人没有大出息，这个人也不会享受到成长的快乐。

什么叫价值？价值是你给别人、给社会的贡献，别人、社会对你的承认，这才叫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中国的事业对中国的大学所产生的需要，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这么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服务我们的国家、服务我们的现代化。而我们国家和现代化提出的这些尖锐的问题、鲜活的

问题，这些极富有挑战性和引领性的问题，绝不会辜负了中国学子的才华。

记者：您怎么看当代青年？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作为过来人，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寄语和期望？

刘伟：世界是年轻人的，青年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对现在的年轻一代，大家评论很多，埋怨孩子说，你看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当年如何。可能你有看不惯的地方，他可能也确实有问题，但是就是有一条，他一定比你这代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千万不要用不同代人的使命去衡量和要求年轻一代，他们有他们的任务。你要相信人类是不断地进步的，无论是在知识上、科学上、文明程度上，他肯定是不断地进步的，否则人类就是倒退。

我喜欢年轻人，我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在大学里，我教了几十年书，我面对的是永恒的年龄。每年新生开学的时候，永恒的18岁。年轮是不断在增加的，你千万不要低估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能力。你千万不要拿你的尺子去衡量他们，你要充分尊重他们。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但我很享受。

记者：对已经毕业的或者马上毕业的学生，还有下一步马上要走入高校的新生，最想叮咛他们的是什么？

刘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憧憬自己的未来，这里面肯定会有些许不安。你要相信自己，你也要相信这个国家，千万别怕。我觉得就像家里的孩子出远门，孩子有了惊吓，他到父母身边，其实父母往往说的第一句话也是你别怕，我觉得这个很要紧，大家不要怕。

2018年，学校为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在明德广场上树立了一个模型——



2015年11月20日，刘伟赴中国人民大学就任校长

张巨大的火车票，始发站“延安”，本站“中国人民大学”，下一站“前程似锦”。我们要奔向我们新的前程，勇于面对一切事物，敢于斗争，敢于面对困难。你要积极向上，要有好的价值观，要向上，要追求美好。

记者：在您心中，“人大”二字意味着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期待？

刘伟：真的挺深的，我在人大是一种责任。我到这来是当校长，那我有我的责任。党和国家、政府、学生对我是有要求的，说老实话倍感压力，也倍感荣光。

记者：融入血脉了。

刘伟：人大一定是一个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也好，赢得普遍尊重的而且富有特色的一所高校。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就期待着进一步地光大。

“有志气、底气、骨气， 这是做人最要紧的东西”

记者：你如何看待高校校长的职责和使命？

刘伟：大学是培养人的殿堂。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最基本的任务、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立德树人。

培养人首先要回答“为谁培养人”，再回答“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校长，应当既是教育家、学问家，又是政治家。所谓政治家，就是要把好办学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人才。

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很好地实现培养“人”的目标。一是让学生有思想、有价值追求、有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让学生有智慧，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三是让学生有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不断学习的能力。总之，要让学生在大学长思想，长智慧，长知识。

记者：育人中有什么学问？关键是什么？

刘伟：育人首先是育德，这是最关键的。教一个好人学本领相对容易，教一个有本领的坏人学好难。育人就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做一个好人。如果一个人能力差，可以通过知识训练让他长本事，如果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歪了，品行坏了，改好很难。

所以，学生入校后，我们会从教



2015年12月31日,刘伟与同学们庆祝新年一起包饺子

学、生活、接人待物等方面,给学生塑造一个有正气、有理想、有正义感的环境,让他们形成健康、坚定的信仰。有志气、底气、骨气,这是做人最要紧的东西,有了这些,即便哪方面知识不够,将来还可以再学。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成长跟国家和民族事业割裂开、脱离开,就不会有大成就,也不会享受到成长快乐。价值不是孤芳自赏,是别人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承认。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被尊重,才能真正享受和体会到价值。

“我们办大学必须顶天立地”

记者:你怎么看“双一流”建设?

刘伟:“双一流”建设与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相连。人大作为入选高校,倍感压力,倍感荣光。

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如果高等教育在世界领先,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总体在世界也会领先。没有高等教育的超前发展和领先地位,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肯定不充分,国家现代化水平也难以全球领先。反之,一个国家如

果现代化发展不居领先水平,就提不出好问题给教育,也难有足够能力支撑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就难以在世界领先。可见,国家现代化进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的同一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这一进程已不可逆转,它提出很多尖锐、鲜活、富有挑战性和引领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培养人,认真面对,认真解决。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世界受

人尊重,一定要先解决好本国、本民族的发展问题。因此,我们办大学必须顶天立地。“立地”要扎根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现代化,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顶天”要达到世界标准。

记者:你认为我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什么?

刘伟:关键是大学发展要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保持一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脱离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难以孕育出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培育,一定与大学为这个民族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迫切的历史要求,也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时代如此迫切地需要大量人才服务国家现代化。我们要满足这种历史要求,不能辜负历史期望。

大学的老师、建设者、受教育者,要深刻认识并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和挑战,努力学习和工作。在这样一个波澜



2015年12月31日,刘伟与同学们庆祝新年合影

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也许每个人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回过头看，真正伟大的事情就是微不足道甚至渺小的事情汇聚的洪流。

回到大学根本——育人。世界一流大学有很多标准，其中一个基本标准是人才培养。中国基础教育从应试水平来说已达到世界高水平。中国顶尖大学每年通过高考可从全国录取到最优秀的新生。这些新生跟任何国家比，知识能力、知识结构、知识基础等都是世界一流的。

一流中学生进入大学，能否通过四年学习，成长为一流本科毕业生，这是对大学是否一流的重要检验。做不到这一点，一所大学无论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少国家级、世界级实验室，都难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发展和布局上会有战略性转变”

记者：人大在“双一流”建设上取得了哪些成就？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刘伟：人大有14个学科入选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有9个学科获评A+。

过去5年，在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双一流”建设已达到设定的初期目标。前不久，教育部组织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人大获奖84项，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奖评选也连续多届名列前茅。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3名教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其中两名来自人大，一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先生，另一名是法学家高铭喧先生。

“十四五”时期，学校在学科发展和布局上会有战略性转变，从速度、规模更多转向提升学科质量，做到独树一帜，顶天立地，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现在正把这种共识转化为行动方案，落实到具体教学上。

我相信，人大未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一定是能赢得普遍尊重且富有特色的高校。



2018年11月，刘伟、靳诺陪同刘延东同志看望袁宝华老校长



2018年11月8日，刘伟校长在人大北区食堂亲自下厨“露一手”



2016年，刘伟会见UCLA校长



2016年，刘伟看望袁宝华老校长



2018年2月，刘伟看望黄达校长



2018年教师节，刘伟看望戴逸先生

记者：提升学科质量的要义是什么？人大为此做了哪些调整？

刘伟：首先是调整优化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学科建设结构，让其符合教育规律、时代发展要求、社会需求。这些年，学校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提倡学科间交叉融合，培育一些和数学、数据科学、统计学等学科有交叉的新学科。高瓴人工智能学院、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都是为培育新学科新设的。

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人大的学科发展体系是“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那么“十四五”时期将强调“厚重的基础学科，卓越的社科学科，引领的交叉学科”。

其次是进一步凸显研究型大学特点，提高研究型教育比重，根据学科特点和国家社会发展需要，让研究生分类培养更清晰。整个过程我们会十分注重立德树人，特别是思政课建设。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全国是A+学科，这些年，我们把思政课建设抓得很紧，思政教学队伍构成、规模及教学科研水准在国内都占据领先和示范地位。

最后是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人大有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等高端智库，有一批非常好的学者，多年来给国家相关部门及市场撰写各类报告，产生了广泛影响。我相信，立足现有优势，人大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有作为。

“要让老师对自己前途和未来成长有明确预期”

记者：师资队伍建设的“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人大在师资队伍建设的上有什么经验？

刘伟：一个好的学术平台和环境，可使人得到成长和发展，这对吸引人才特别重要。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杰出学者聘任计

划。根据人大师资队伍总规模和近些年发展情况和前景设立了约600个杰出学者岗位，聘期内聘任一批优秀教师，给予其物质条件和学术团队，让其更好发挥作用。

我们会根据思想道德、学术水平、敬业精神、对学生的关切度、对教育的热爱等综合因素对老师选拔聘任。采用此标准，还可以在国内外延揽人才，极大降低了人才引进中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

我们还逐渐推出更富竞争性的聘用制度。例如，让一些新的学科、学院进行全球招聘，在国际市场寻找最优秀的教师，以最高标准吸引人才。

我认为，在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上，一定要有明确制度。只有让老师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成长有明确预期，他们才能做好选择，安心工作。

此外，还得有人文关怀。管理毕竟是对人的关系的安排和处理，得合情合理，不能不顾情理，没有温度。要把制度规定和人文关怀统一起来，以形成规范，调动大家积极性。

总之，在师资队伍建设的上，要大胆改革，实事求是，在稳定性和不断变化间寻找平衡，各方面都要有清晰的政策和制度界定，统一在一起就能建设比较稳定、健康、有活力的师资队伍，支撑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

记者：创建“双一流”还应做好社会服务，人大近年在校地合作上有什么亮点？

刘伟：高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资政启民，为社会服务。包括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也包括服务和支援地方发展。师生也能在服务地方同时从地方社会发展实践中汲取养分，提高认识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人大与很多省市、企业签署了共建协议，服务社会、融入社会的趋势明显提升。例如，我们按照教育部统一部署，从教育扶贫角度，对口帮扶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我和人大党委书记靳诺以及师生团队，多次前往兰坪中小学，在那里建立人大班，举办手拉手活动，努力在脱贫攻坚中做出人大贡献。

我们还推荐许多毕业生作为选调生到地方工作，到基层锻炼、摔打、学习。每年暑期，我们都会去看望选调生。近年来，人大有近2000名毕业生作为选调生扎根基层，他们一般比较低调，脚踏实地，能虚心学习，也比较服从组织安排，知识结构、文字能力、表达能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都比较强，到基层后会很快凸显出来。

“千万不要拿旧的尺子衡量年轻一代”

记者：你怎么评价人大的毕业生质量？

刘伟：人大现在每年毕业的学生，有约60%是研究生，约40%是本科生，有就业意愿的毕业生，基本能实现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从社会接受和认可度看，人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他们中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的，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行业各领域及党政部门做出积极贡献的。例如，引发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还有撰写标注改革开放新征程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二位都是人大校友。

记者：你怎么看当代青年？对大学毕业生最想叮嘱什么？



刘伟：现在对年轻一代，大家评论很多。可能大家有看不惯年轻人的地方，年轻人可能也确实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同时代会塑造不同时代人的品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千万不要用过去那代人的想法衡量和要求年轻一代，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使命。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强，无论是在知识上、科学上、文明程度上，人类都在不断进步。

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我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书，每年新学期开学，面对的都是18岁，但年轮是不断前进的，作为老师，我需要不断调整，在课堂上与学生沟通交流，这对我很有挑战，但我很享受。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年轻人的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能力，也千万不要拿旧的尺子衡量年轻一代，要充分尊重他们。

每年都有很多毕业生走向社会，我想跟他们说两点。一、面对陌生事物和可能出现的困难，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国家和社会，千万别怕，要勇于面对生活和困难，敢于斗争。二、要积极向上，追求美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本文由作者提供）

我与经济学院的点滴 ——北大经院建院（系）110周年院庆

文 / 刘 伟

编者按：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始建经济学科，这是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学专业。1919年，经济学科改为经济学系，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2022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迎来建院（系）110周年华诞，官微特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977级本科生，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百年华诞所著文章，传承经院百年精神，共担经世济民情怀。



刘伟在北大经济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留影

我是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77级）进入北大经济系的，算下来到今年春天已经整整34年了，入学时我刚及弱冠，现在已经是55岁的人了，时光真快。在北大经济系（1985年后改建为经济学院）这30多年间，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先后获得了北大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据当时的校长吴树青先生说，当年我是北大社会科学部各院系中最年轻的教授）。自1993年起，我开始兼任行政工作，连续任了两任副院长，协助时任院长的晏智杰教授。自2002年起任经济学院院长直到2010年任副校长。一步步走来，北大经济学院与我的生命，与我的成长，的确不是简单的言语能表达清楚的，我敬仰她，依赖她，更从心底爱戴她。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我从北大荒到北大，我说看起来一个是荒原边陲，一个是学术殿堂，天壤之别，但对我的影响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那个年代的北大荒人与自然间的争斗之残酷，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自然，尊重的是在大自然争斗中的强者，因而不太承认人们相互间社会背景的差异；那个时候的北大，人与科学间的对话之艰辛，使得人们首要的是回答如何面对科学，尊重的是在科学探索中的收获者，因而不太关注人们相互间社会身份的不同。北大荒和北大共同推崇着一个事物：公平。我是“文革”期间，随父亲下放到北大荒的，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少年并初入社会，在当时叫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师20团5营5连做农工。虽不是出生在那儿，但确是长在那儿，直到21岁进入北大经济系。到现在，我真正生长过的地方只

有这两处。在北大荒时间不长，却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形成。但真正教我带我长大的地方是北大经济学院，不仅是已过去30多年的时光，而且更在于她塑造了我的品格，赋予了我力量。

其实，我高考填报志愿时，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因为我不知大学里还设有经济学系，不知道还有所谓经济学这样的学科。那个年代不重视经济，更不重视经济学，再加上我中学读书支离破碎，多有无知。也可能是由于高考考得不是很好，所以被调剂到北大经济系，如果那时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吸引人，或许就轮不到我来学经济学了。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在北大荒，我不知道大学经济系是学什么的，甚至对通知书上写的录取为“北大普通本科生”的含义也不十分清楚，何谓“本科生”？何为“经济学系”？挺茫然的。

带着这种茫然我进入北大经济系，当时是在大饭厅（现在的百年大讲堂）迎新，刘文忻老师迎接我并帮我把行李送到37楼宿舍。我见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系学什么”？本科四年真的非常刻苦，不光我，整个77级，整个中国，在经历了文革劫难后，都开始了疯狂的学习和追赶。

有趣的是，大学本科四年下来，我们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专业方面自不必说，没有一本出版的教程，甚至外语课也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活页，而且是每堂课后发下堂课用的部分活页。有一门课是“世界经济地理”，需要画很多地图等，主讲老师是陆单明先生，讲义是他一笔一石刻钢板油印出来的，地图也是手工刻画的，真不容易。陆先生的课讲得精彩极了（他已经走了许多年了，前几年他的学生们还聚在一起怀念他，并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我还受邀为文集写了序）。在当代大学没用过一本公开出版教科书的本科生，可能就是们了。那时百废待兴，老师们也在准备。但这种状况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我们，使我们看了大量的参考文献和教材之外的东西。

还有一件趣事，我们全部课程中，几乎没有一门课是由一个老师从头至尾全部承担的，大都是由几位老师合开的。记得《政治经济学（上）》是由萧灼基、傅骊元、王茂根、张秋舫、何绿野等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下）》是张友仁、刘方棫、李克刚、解万英、智效和、睢国余等老师讲授；《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是由胡代光、厉以宁、范家骧、刘文忻等老师讲授；《外国经济学说史》是由陈岱孙、靳兰征、晏智杰、商德文等老师讲授；《世界经济》是由洪君彦、张康琴、朱培兴、张



20世纪80年代，陈岱孙、陈振汉及夫人、厉以宁、王铁崖（法律系教授）等老师合影



刘伟与陈岱孙先生

德修、巫宁耕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史》是由陈振汉、熊正文、李德彬、蒋建平等老师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由赵靖、石世奇、陈为民等老师讲授；《部门经济》是由杨勋、张国有、何凤琴等老师讲授，等等。其他课也都如此。这一方面可能是拨乱反正初期我们的老师也需要时间备课，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机会领略了几乎全部当时经济学系的老师们的风采。这里的老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精彩，个个都

有一段吸引人的故事。

先说陈岱孙先生，大家都称他为岱老。出身名门，叔祖陈宝琛曾任过晚清皇上的国师，家族中曾出过二代三人同科中第的盛事。岱老5岁发蒙，自幼饱读经书，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我曾读过岱老写的一篇散文，题目好像是“闽江号子”，写的是游子回乡，居闽江畔，回想当年的心境，文笔棒极了），后考入清华留美班赴美读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清华任教（据说曾获哈佛



2003年，刘伟看望陈振汉崔书香先生



刘伟看望赵靖先生



刘伟看望张友仁、张秋舫先生

大学“金钥匙”）。20世纪20年代，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抗战爆发后去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岱老作为清华大学的接收大员，最先回北平（京）接收资产的。岱老当时曾写信向时任北京市市长的何思源，为清华大学要一块农田作农学院试验用，要成了，就是现在在北农大那片地。又要圆明园，做清华大学新校园之一部分，没有要成，为此，岱老曾致信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表示遗憾。2000年岱老百年诞辰时，在北大召开的纪念会上，清华大学来出席会议的老师还专门从其文档馆里找到了当年岱老给何市长的信，并在会上讲了信中提到的事情（后来，直到90年代初，岱老还曾嘱我可以再以北大清华名义要，若能要下来，北大校园可真就更不一般了）。当时就流传说梅先生办清华依靠“两孙”，一为叶企孙（主管教务），二为陈岱孙（主管总务），岱老不仅是大学者，也是很有行政能力的，只是后来再没显示这种能力而已。岱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北大经济系一直到1997年走，期间任系主任，直到1985年经济系改建为学院之前。岱老1949年之前写过不少深刻的文章，特别是批评蒋介石政府的通货膨胀等文章，也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拟聘院士名单上。朝野上下，是十分被人尊重的。岱老的课讲得精彩、干净、儒雅。听得来，学不来。岱老的高贵是令人震撼的。好像是1988年夏天，一天黄昏吧，我和新乔兄（现在经济学院的平新乔教授）在未名湖边遛弯，夜色里看见前边好像是岱老散步，看背影的气度像，但依稀看见穿的蓝色上衣袖子上一大块洗得泛白的补丁，又觉得不相称，那时国家虽还很贫困，但在北大校园里穿补丁衣服的人的确已是很少见了，我们追上去一看，真的是岱老。那块补丁，那份气度，在岱老身上是那么美妙地和谐为一体，当时真令我感动，直到今天也忘不掉。岱老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刚入学不久，代表学校主持接待来访的墨西哥总统，从北大南校门向北走到图书馆东门，我们学生在西边夹道欢迎，那天岱老穿了件黑色呢质中山装，拄一拐杖，陪墨西哥总统一路走过来，典雅、淡定，真



刘伟看望石世奇先生



刘伟与硕士生导师张友仁、刘方棫合影

是难用语言表达。相形之下，我们同学甚至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到底谁是总统啊？1997年岱老仙去时，主持丧事的岱老外甥女唐斯复女士曾问我，岱老穿什么衣服走，我给她讲了上边的故事，后来岱老就是穿那件黑色中山装去的。我们去送他，见到的还是那份从容、高贵、安详的神态。这是骨子里的气质，有了这种气质，即使着补丁衣也是任何华丽无可比拟的，即使睡去也还昭示着大雅。去年吧，岱老的后辈写了本传记式的著作，怀念岱老，反映的是从1900年到1952年岱老的生活和事业，取名“孤帆远影”，作者赠了我一本，读下来，故事真亲切，书名真贴切。从1952年直到1978年的20多年里，岱老再没发过学术性的文章，表达过观点，在20多年里“一言未发”的沉默，是一个学者对那个年代的唯一可行的抗争，这才是真正的尊严所在，尽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这种高昂支持着真正的高贵。

经济系还有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先生，熊正文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给我们上课时，但凡提到政府皆称“当局”，提到共产党则称“贵党”，一派老式旧学的学究气。据说年轻时曾

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做过助手（秘书之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大重新聘评教授职称时，他由原来的教授被下聘为副教授（好像是当时北大唯一的一位下聘者），直到他前些年以九十多高寿去世时，依然是副教授。熊先生学问做得很执着，他们有一课题组，是做“清实录”研究的，课题组坚持做这一项目65年，文革期间为保护所做的卡片，熊先生等人把相关资料藏在家中地板下，以防红卫兵抄家受损。改革开放后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了一部分。前几年过春节，课题组还有三位老先生在世，其中最年轻的殷汉章先生当时也已有89岁，其他两位都在90岁以上（另一位是陈振汉先生，当时93岁），他们还聚在一起录了一段聚会的影像，说是年事已高不能来院里参加会议，自己录了一段片子给大家助兴。课题组的老先生们走时，这个项目大约完成了三分之一，此前90多岁的陈振汉先生给当时的许校长写信，希望学校予以支持这一项目，许校长把信转给了我，我安排了一笔经费和专门的博士后招生计划，由萧国亮教授牵头，从老先生们手里把项目接了过来，主要是从熊先生手中接过他们做的卡片和整理的文献，初时熊先生

尚多有不舍，毕竟几乎是一生的心血。后来老先生也想通了，很支持，现在进展顺利，可能再有10年左右能做完项目吧，对熊先生来说，差不多可以说穷尽毕生精力于这一项目上了。现在抱这种研究态度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很想借写这篇小文章的机会，说说这件事。熊先生父辈是晚清的大官，据说做到封疆大吏（山东巡抚），所以家中颇殷实，尤其是很有些字画古董，也有金银财宝，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一些，许多一直未找回，但家中总还是有些底子的。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图书馆翻修时，熊先生曾捐出过两幅板桥真迹，有人说熊先生是北大首富，我没有考证过真伪。但我的确问过熊先生，是否有人们所说的那些宝贝？老先生没直接回答，只是调侃说，金银财宝是见过些的，那是家父“监守自盗”而来。熊先生极朴素，朴素得让人难以理解，常年穿着打补丁、洗得花白的衣裤，春秋时节还常戴一顶单帽，但帽子顶上是破的，甚至常在垃圾箱里捡人们扔的菜叶，说是洗洗照样可以吃。家里堆的都是书和报，进房间没法走，要跳来跳去找插足之地，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熊先生为何变成这样？熊先生写一



刘伟与同学们为博士生导师萧灼基先生祝寿

手好字，有一段时间《经济科学》杂志的刊名用的就是熊先生题的字。比当今许多著名书法家要棒。熊先生对当今书画界著名人士也有些评价，记得他曾夸赞说，范曾先生的字比他（范曾）的画要好，但他（范曾）的字不怎么样。

我还想说说曾任我们支部书记的解万英老师，其实解老师不能算作老先生辈的人，他是20世纪60年代初毕业后留校任教的，若还在世，现在也只有70多岁的样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陕西黄土高原考进北大经济系的，农村娃，质朴、耿直、真诚。记得我刚毕业留校时与解老师同在一个教研室，他还任党支部。我爱人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择业时，初时联系去国防大学任教，解老师的一位大学同学恰在国防大学相对应的部门任领导，为促成进国防大学一事，他带我骑自行车，晚上很晚了去他那位将军同学家，特别热情地向人家推荐，好像还备了薄礼。虽然我爱人后来留在了党校，但我始终忘不了解老师那份热心，特别是在困难无助的时候所给予的关爱，往往是会让人记住的。我这里提到解老师，主要倒不是因为这些事情，而是我感慨和尊重他的信仰之坚定。他受的是很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刘伟与北京大学经济系七七级部分同学合影

和思想，对他不仅是知识，更是信仰。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决议中，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导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统一为一体，这既有悖西方经济学传统，更有悖马克思理论传统。解老师或许接受不了这么大的转变，不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而且是信仰上的崩溃。不知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但他的确是看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并在登载决议的《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类似“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话之后，从学校四教顶楼坠落下去身亡（公安部门鉴定是排除他杀）。当年此事在海内外曾引起不小的振动。曾有北大经院学生们说要为解老师送葬，因为这年头为信仰而死的人太少了。北大经院学生若为一位因不赞同中央的决议而殉命的老师送葬，这可不是件小事。我当时在院里负责研究生学生工作，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所以接通知说，一定不能让学生送灵，特别是不能送出校园。送解老师走是一大早，春寒料峭，我见到了石世奇老师（曾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周元、智效和老师等。那天早上我去北大校医院太平间为解老师做走前的准备时，我爱人特别嘱我送上一束花，抬解老师进灵车时我在覆盖他的白布单上放了束花，仓促间

放得不是很正，智效和老师把花摆正后抬走了。那天，是解老师陕西老家的哥哥来为他穿的衣服，他们是一对老老实实的陕西农民。我没让解老师的夫人进太平间，她哭得很难过，要进去帮忙，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进去，因为我看过，知道是什么样，我不想让她看见。其实，我是不赞同解老师的观点的，但我忘不了他，因为他是个有信仰的人。你可以不赞同他的信仰，但你不能不敬重他的坚定。

前面讲了我所知道的三位已故去的老师的故事，我是想借此告诉人们，什么是做人的高贵？什么是做学问的执着？什么是恪守信仰的坚定？北大经院老师的故事还有很多，不仅有那些已故去的先生们带走的精彩故事，而且还有许多健在者的故事，相信更有更多后来者创造的故事。囿于笔墨，我不能一道道来，特别是对于健在者，许多我是极敬仰的，他们身上的故事也是极富启迪价值的。今天在这儿，我就先不说了，待有时间，我是想细细说的，不只是怀旧，更是尽一份传送“美好”的责任。

感谢经济学院组织的这次百年院庆活动，感谢借这一活动给我写这篇小文的机会。

刘伟：深切悼念厉以宁先生

文 / 刘 伟



厉以宁（1930年11月22日—2023年2月27日），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仪征，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闽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顾问，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厉以宁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建为经济学院，是改革开放后北大设立的第一个学院），毕业后留校在经济系任教。1985年到1992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

厉以宁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著述等身、潜心育人、桃李天下，以思想引领时代、以学术报效国家，为中国经济改革与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先生始作于1955年、扩展于1985年的这首诗《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勇



厉以宁先生手书的“敢当”石下，师生用鲜花寄托哀思。

毅进取的创新精神、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2月27日，是个星期一。中午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副校长董志勇教授的微信，告知接到协和医院的通知，厉先生已经进入弥留状态。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整个下午总是安静不下来，不断地翻看手机，看有无奇迹发生。到了晚上先后接到北大校办李钰秘书和志勇的信息，告知厉先生已于19点31分走了。尽管厉先生从2020年8月底住进协和医院之后，一直处于病重状态，长期住在ICU，加之年事已高，毕竟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真到了面对这一现实时，心里还是难以接受，总觉得厉先生应当能够出院回家。2021年、2022年两年春节，我和我爱人一起去看望厉先生夫人何老师时，都说起，待厉先生回来后，再去看望他老人家。今年春节因为在外地，没能去看望何老师，在电话里又说到厉先生会康复，待回京后去拜访。没想到，说走就真的走了，心里真难过，不胜哀痛！隔天3月1日，经志

强联系，我们夫妇一道去厉先生家，给厉先生灵位上香，哀悼厉先生；看望何老师。在厉先生家书房临时布置的灵堂里，站在厉先生遗像前，我久久地凝视着，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从1978年2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进入北大经济系读书开始，作为厉先生的学生，后留校任教又在厉先生身边工作，直到2015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仍不断参加厉先生主持的活动，聆听厉先生教诲，到现在已整整45年。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深深地鞠躬、默默地说道：谢谢您！那天，我们77级班上的于吉和毕井泉两位同学也在场。稍后，他们在同学群里发了条信息，提出以北大经济系77级名义给厉先生敬献花圈，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这是非常好的极富意义的提议，我们是在向一代宗师致敬，也是向一个时代致敬。

一、学识渊博

厉先生学术思想的系统介绍已有学者做过很好的工作，我不去更多重复了，我想说的是厉先生在经济领域涉

及的学科范围之广，对各学科和学派认识之深，是少见的。我入大学读书期间，厉先生是在北大经济系外国经济思想史（含西方经济学）专业（教研室），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后来在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比较经济史课程。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虽然有联系但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而且要讲好都需要深厚的功力。厉先生的课在当时的北大是最受欢迎的课。待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时，厉先生又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课程，而且还曾给研究生主讲过《资本论》课程，都是最有吸引力的课堂，大跨度的融会贯通，所以厉先生的课让我“听得来、学不来”。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术界对国外学术情况了解不够充分深入，在大学的讲坛上，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没有规范的讲义，我们在读书时甚至还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用的是打印出来的专题性介绍材料，而整个社会却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学习和了解的强烈需要。于是，陈岱孙、于光远等先生发起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邀请并集合全国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在北京举办公开专题讲坛，就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支、主要流派设定不同专题，邀请在这一专题上有研究和教学造诣的学者主讲。其中厉先生主讲的题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跨度最大，涉及多学科的主题。这一系列讲座后来由出版社结集出版（共四个分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记得北大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这套讲座集对他及周边的同代人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有许多人把这一系列讲座及结集作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启蒙课程和教科书。后来，于光远先生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及此事，记得他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分配主讲任务时，有些题目国内学者大多不了解，分

配不下去，光远先生便强行派活，说：没有人认领的题目统统由厉以宁承担。除涉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外，还涉及诸如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多个分支领域，这既是厉先生在那个系列讲座中成为主讲最多的老师的直接原因，也是光远先生对当时年富力强的厉先生的学术信任。

二、思想睿智

“北大是常为新的”，这首先是建立在北大拥有一批具有思想创新引领的先生。厉先生在北大是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厉先生曾获得北大首届蔡元培奖，就是对其教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厉先生的课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并不在于厉先生口才多么好，更不是“妙口生花”。厉先生讲课的语言中规中矩，甚至有时有点口吃，但由于厉先生的课有思想的魅力，所讲内容逻辑严谨、思想深邃、要领精到、引人思考，因而在课堂上的思想交汇令人神往。而思想性的基础则首先在于对已有知识的深入系统准确掌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独立的“批判”才真正有魅力，才能切实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我的77级同学何小锋教授曾同我谈起他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读本科期间对“劳务价值论”展开研究，重要的原因就是课堂上听了厉先生关于劳动价值论观点的讲授之后产生了新的想法，后来写成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厉先生关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不仅功力深厚，而且思想启发性突出。比如，“英国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在大量的资料批判基础上，往往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弄清经济史和思想史过程。他在1964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一篇关

于美国经济学边疆学派的论文，对美国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弹性之所以较强的分析，我在近期写作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章时，仍由此获得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体系、观点等各方面全方位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厉先生在北大另辟蹊径，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记得开始是选修性质的公开课，教室在一教，由于事先对选修人数估计不足，结果多次更换教室，最后调整到一教二楼大阶梯教室。一位常年主讲外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的教授开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在当时还是很轰动的。来听课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校外许多学生和研究者，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也很关注，不仅预约了这部讲义的出版，而且在开设课程伊始，就委派了一位资深编辑随堂听课。厉先生请我和孙来祥老师作为助教，随堂听讲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答疑及教务工作，使我获得了系统学习厉先生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难得机会。后来我和孙来祥等还陪同厉先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受邀到各地去举办专题讲座。一块儿去的还有北大出版社的彭松建老师、海淀教育局的刘天申老师、当时刚留校任教不久的平新乔老师等。厉先生主讲，我们分别承担部分内容，印象里去过哈尔滨、青岛等。后来为了适应教学需要，我和孙来祥老师在厉先生指导下，根据厉先生的相关思想，由厉先生审定，编写了一本简编本教材，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和孙来祥联名写的关于厉先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评论文章（1988年）。在这一过程中，使我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从新的角度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对厉先生



刘伟与厉以宁先生



的睿智思想有了深切感受。

三、辛勤耕耘

厉先生真的可以说是著述等身，除承担大量教学任务外，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多门课程，厉先生还兼任行政职务。开始是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后作为始创院长，把国民经济管理系发展为著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初期北大四院里的一间办公室（早年间是四院里锅炉间和水房）成长为北大校园里目前光华的一派气象，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厉先生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中的要职，也要占用许多时间。但厉先生总有新作不断，除学术论文外，持续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同厉先生在一起开会或与厉先生并何师母一同家庭聚会时，厉先生每每有新著送给大家。而且每次送我的新作，厉先生都端端正正写上“送刘伟、李庆华贤伉俪惠存”的字样，不能不让人惊叹。

我曾问过厉先生，哪有时间写下这么多著述？厉先生说他有诀窍，就是每天坚持写作，或长或短、或多或少，而且大多是早晨起早写作，因为清晨脑子清楚，尤其是没人打扰，可以自己掌握。陪厉先生出外地讲学、调研，常常在早餐时，厉先生已经写完几页大稿纸了。他鼓励我不妨试试，天天坚持写点文字，哪怕千八百字，累日积月下来就

很可观了。厉先生的诀窍和鼓励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虽难以坚持天天晨写，但的确养成了持之以恒地读书写作习惯，久而久之，每天不读或写点文字似乎对不起时光，有种欠债感和内疚感，因为前面有厉先生，高山仰止。

厉先生80大寿那年，学生们在一起为厉先生和何师母庆生，来的人很多，喜气洋洋的。记得我作为厉先生学生代表发表了祝词。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核心是祝福厉先生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祝词之后，厉先生同我说，他已做好了八十之后的学术研究写作安排，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已有基础了，准备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但至今未能完成的一些学术计划。我知道厉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后，长期在北大经济系资料室工作，而当时北大经济系老系主任陈振汉先生因被打成右派也被停止了教学工作，安排在资料室。陈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史方面学术研究造诣极深，后来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曾修过他主讲的比较经济史学课程。据厉先生回忆，当时陈振汉先生曾给予他很有价值的指导，厉先生与陈先生后来（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合作出版过一部关于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工业区位演变史及理论进展。在那些年，厉先生积累不少资料，后来由于不断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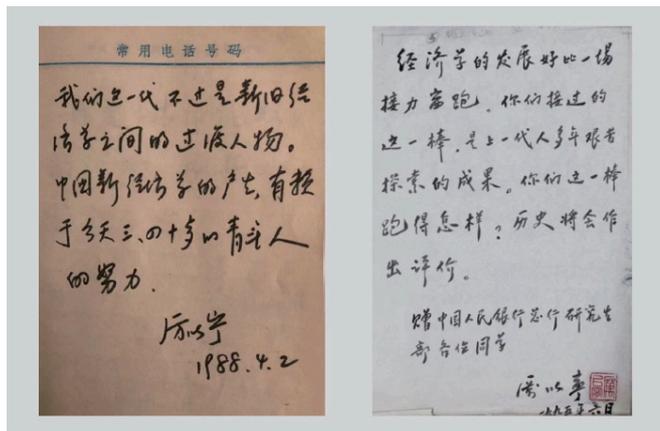
动，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正常的学术活动都被迫中断，厉先生一家也都去了北大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之后，关于改革的研究又成为厉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所以关于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如愿。80岁之后再重新拾起来，不能不说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毅力的，甚至不知道能不能达成目标。令人惊叹的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厉先生关于经济史研究的多部系列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除《厉以宁经济史学论文集》外，多卷本的古希腊经济史、古罗马经济史等陆续发表，累计有几百万字，令人难以置信，真是老骥伏枥。

四、锐意改革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党和国家为表彰在改革开放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探索实践者，授予他们以“改革先锋”。厉先生荣获这一殊荣，当之无愧。厉先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效应，因而获得这一奖项。其实，厉先生以往的学术研究集中在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关注并不太多。改革开放伊始，厉先生敏锐地感觉到了改革发展对经济理论创新的实践需求，毅然放下了自己以往的研究，把研究重点调整到中国改革开放现实问题上来，而且还动员并带动学术兴趣志向相同的一些学者，共同关注现实问题。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学者、光华管



张友仁先生(前排中)90寿辰时,刘伟校长(后排右)代表北京大学到场祝贺,厉以宁老师(前排右)、张友仁先生的学生林毅夫教授(后排中)等都来参加生日聚会。



厉以宁先生手书寄语:我们这一代不过是新旧经济学之间的过渡人物,中国新经济学的产生,有赖于今天三、四十岁的青年人的努力。

理学院曹凤岐教授曾同我谈起,厉先生当年动员他跟随厉先生一道开展关于股份制问题研究的经历,说如果没有厉先生当年的反复动员,他是不可能关注股份制及证券、股市、资本市场等问题研究的,更谈不上取得成就。经济学院原党委书记(我读本科时的辅导员)刘文忻教授也曾同我谈到,厉先生当年动员她与厉先生一块儿开展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事情。厉先生自己曾经同我谈起过他之所以把学术兴趣和研究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现实问题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其实,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是有浓厚的重史薄今的风气的,当年厉先生能做出这种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关于史的研究一放就放到了80岁以后。可以说,厉先生把他学术生命中最成熟最具创造性的年华,奉献给了改革开放事业。

厉先生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研究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观点,已为大家所熟悉。比如关于所有制改革较价格改革更具决定性的观点,关于推进股份制、改造国有制企业的观点,等等,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一是厉先生提出改革建议是以深厚的理论为基础的。我曾多次出席过厉先生参加、另有多位著名改革思想家一道展开的研讨会,厉先

生的发言不仅观点清晰、毫无含混,而且对不同观点,特别是当时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学者的观点,绝不盲从,而是有条有理的剖析其思想学术来源和历史动因,令人信服。二是厉先生的观点具有系统的逻辑根据,并不是碎片化的。记得有一年,广东经济出版社组织推荐影响中国经济的十部著作,厉先生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入选,厉先生自己也认为这部字数不长的著作最能代表他的改革思想。有关方面邀我写篇评论,我就此请教厉先生,为何是这部著作?厉先生告诉我说,非均衡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观点,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分析的是如果不改革,中国经济在体制上不具备趋于均衡收敛于均衡的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也不可能是简单地恢复价格自由竞争制度以达成均衡目标,而是要使体制上具有趋于均衡的可能,非均衡指的是体制性的刚性,中国的改革必须从非均衡的体制刚性现实出发,重点改变这种体制刚性才可能谈实现均衡目标。厉先生关于改革的观点、政策建议均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所以才有了厉先生的所有制改革而非价格改革是关键,股份制改革而非市场竞争秩序构建是根本等多种

具有新意的改革思想。

五、充满爱心

厉先生对学生、对家人充满了爱心。厉先生的老人长期与厉先生一起生活,老少三代无论是住房条件还是收入水平都不宽裕。早些年我们去厉先生家,看到厉先生和何师母对长辈恭敬孝顺,老人也感到舒心。有时去厉先生家,老奶奶也常与我们攀谈,说实话,方言口音挺重的,我大部分听不懂,但我能看到老人脸上洋溢的幸福。记得一次,厉先生当时还住在北大蔚秀园两室一厅的小单元房,有些老师已经分到中关村三室一厅的新房了,我去拜访时厉先生还没回来,老奶奶同我边谈边抱怨,大概意思是说房间小,新分配三室一厅单元房厉先生条件上还差一点轮不上(好像说是工资级别还差点儿),老少三代住在一起,厉先生看书写作都没有地方,苦了厉先生了,等等。对厉先生和何师母很是满意而且也还夹杂着替他们的委屈。

厉先生对何师母真的是好。年轻时热恋却又两地分居,厉先生的诗词选里,有早年写给何师母的诗词,挺浪漫的。后来由于常有机会与厉先生、何师母一同外出、一同聚会,看到他们相互

之间的关心体贴、相亲相爱，令人感动。印象里厉先生每次外出，何师母几乎都相伴左右，厉先生不放心何师母一人在家，何师母也不放心厉先生一人外出，两人从不分开。厉先生去世后的隔天，我和我爱人去看望何师母，我爱人和何老师相拥而泣，何师母反复说着：他走了，把我一个人丢下了。我们听着心里难过极了！

大约在1994年，厉先生和董辅初先生共同发起，邀请部分学者组织了一个双月座谈会（近年改为季度座谈）。我记得开始时有樊纲、魏杰、李晓西、宋宁、朱善利、范恒山、韩志国、林志远等中青年学者，还有戴园晨、秦宣仁等稍年长的学者，后来又有江平、刘鸿儒、隆国强、杨再平、陈玉宇、周黎安、龚六堂、黄奇帆、林永生、程志强、张维迎等陆续加入。董先生去世之后，厉先生又邀请了高尚全先生参加并与其共同主持，厉先生和高先生最后一次主持这一座谈会是2019年（直到现在这个座谈会还在坚持）。在厉先生2020年8月底住院前，每年底最后一次会后，厉先生和何师母都要邀请与会者及爱人共同聚餐、辞旧迎新、相互祝福，也特别向家人们致以谢意。我能体会到厉先生的细致入微，感受到厉先生为大家营造的亲切氛围，使这个座谈会不仅谈得畅快，而且聚得紧密。虽然在长达近30年时间里个别人员有进有出，但总体稳定，一直活跃到现在，应当是不多见的。这与厉先生、董先生、高先生的号召力分不开，尤其是与贯穿始终的厉先生的心血付出分不开。

厉先生对师长极为敬重。在厉先生丰硕著述中，与人合作完成的是很少的，这与厉先生强调思想上的独立性有很大关系，但其中有两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是与厉先生的老师合作完成的。一部是与罗志如先生（早年留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教授）合作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这部著作史料扎实，思想深刻，文字也优美，是在罗志如先生长期积累资料基础上，并在罗先生指导下由厉先生完成的著作。原因是罗先生到晚年身体不好，特别是眼睛吃力、精力不济，厉先生作为罗先生的学生后辈，协助罗先生最终完成。当然，这也体现了罗先生对厉先生的信任。另一部是前面提到过的与陈振汉先生合作完成的《工业区位理论》，也是因为陈先生晚年身体原因，由厉先生协助完成。这种默默地为老师做出贡献的努力，给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

2013年，我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张友仁先生九十大寿。张先生八十大寿时我们原准备庆贺一番，但在临近前几天，师母张秋舫先生突发疾病不幸去世，未能如愿。所以九十大寿时想做一次祝寿活动，但张先生不想太热闹，嘱我只约几位学生即可。遵照张先生意见，我在北大博雅酒店预订了一桌酒席，张先生邀请了厉以宁先生、林毅夫教授等几位。林毅夫教授是张先生的硕士生，高我一届（1981级），但厉先生是张先生的学生一事，我并不知晓。席间，厉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年毕业时是张先生作为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在毕业分配工作时，厉先生是受到冷落的，并未留校，被分配到一所市级党校，是张先生【时任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著名的樊弘先生（早年留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授）】力排众议，坚决要求把厉先生留在系里的。那天祝寿喜筵上，厉先生特别感谢张先生，深切地表达敬意，并提议他、毅夫教授和我三人，作为张先生不同时代的学生与张先生合影留念（那天毅夫教授还专门为张先生写了一幅祝寿的条幅）。我是不敢与厉先生和毅夫教授并

论的，但那天喜筵上厉先生对张先生的敬重之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厉先生十分受学生的爱戴，他也挚爱着他的学生。记得是从1989年起，那年厉先生马上进入60岁，这是个很重要的年份，所以在1989年11月厉先生过生日时，彭松建、刘天申、杨德明、李庆云、朱善利和我等几位学生辈的，提出要为厉先生做寿，地点选在当时海淀镇里区政府办公小院东侧的鸿宾楼吃涮火锅。后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每年参加厉先生庆生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学生还专门从外地赶来。记得在安徽马鞍山工作的鲍寿柏是20世纪60年代北大学生，几乎每年都来为厉先生祝寿，还有许多新老学生，我也不熟悉，大家欢聚一堂为厉先生祝福，那种热烈亲切欢快的气氛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到无比的温暖。

厉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朱善利，和我是大学同学，也是硕士生时同届同学。为人正派、善良向上、严于律己、业精人勤，深得厉先生信任和喜爱，不幸的是在2015年英年早逝。厉先生对善利的离世悲痛极了，特别写下了悼念的词《南歌子·悼念朱善利同学》（2015年9月22日）：“永记师生谊，相交兄弟情。追思往事泪难停，三十余年一晃似流星。院务精心注，教书尽力倾。学风树立悄无声，离去匆忙病榻再叮咛。”词中体现的厉先生对善利的情分之深厚，难以想象。

这几天学校在北大大讲堂设了灵堂，计划7号就要举行告别仪式，送厉先生最后一程。一代宗师，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永远怀念厉先生！感谢伟大的时代！

赶考者刘伟



在北大读本科时候的刘伟

“当年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一声春雷、醍醐灌顶。之后40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时代让你敢想、敢于探索和创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焕发起来。”

经济学研究领域有时在庙堂之上，有时在江湖之远，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没有哪个时代，经济学家会被如此器重。同样，他们也倾尽所有，为中国经济走出一条新路，贡献智慧。

在新中国经济学家族谱中成为第三代翘楚、在中国顶尖高等学府执教30余年，刘伟说他只有6个字：读书、教书、写书。接近他，读懂他，你会发现，1978年那张让他感到费解的北大经济系录取通知书，是带他走向高等学府的钥匙，也给了他40年来从“知道经济”到“经世济民”的勇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于你们而言是句听惯了的话，但在40年前的我看来，就是醍醐灌顶。”刘伟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一直在赶考，机会是起点，时代是动力……

被“赶着”考进北大经济系

刘伟给很多人的感受，是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甚至有些可爱。一次，记者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赴甘肃陇西做扶贫调研，恰好与刘伟分在一个小组，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亲力亲为。东听听、西看看，话不多，但总能问到点子上；愿意和老乡们在一起，有时到田间地头或者是老乡家里的柴房调研，蹭上一身灰，也非常自然。他享受这个过程。

采访约在北京寒冷薄雾的深秋早晨。虽然后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博士生

开班致辞，但对记者的提问，刘伟丝毫没有懈怠。

“这个季节如果在北大荒，是不是已经很冷了？”

“北大荒的冬天冰冷刺骨，国庆节前后开始下雪也是常有的事。“1977年，就是在这样的深秋，20岁的刘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20团5营5连的工作岗位上，欣喜却又不安地听到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时隔41年，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刘伟嘴里说着“很复杂”，但嘴角上翘分明告诉听者，他当时很兴奋。”

20岁之前，虽然他努力做到在任何时刻都保持良好状态，以此向在抗日战争中屡获战功却也遍体鳞伤的父亲证明自己。但对于他，以及他那一代人而言，生命的序曲非但不是华篇，甚至色调灰白。

“我1957年1月出生在河南，祖籍在山东沂蒙山脚下的蒙阴县，那里不怎么出名，但有一块‘很著名’的方形石头，叫孟良崮。”关于家族再远一点的历史，刘伟已经追溯不到了，他只是知道，从爷爷辈到父亲这辈，没什么人读过书。

“我上学早，5岁多就上小学了。那时小学还分为初小和高小。1966年，我初小毕业，按现在说就是读完了小学4年级。应当升高小时赶上了停课闹革命，我对这事印象很深——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到机关礼堂看大



在北大读本科时候的刘伟

字报。当时学生们认为去看大字报就不用上课了，还都挺兴奋，但也是从那儿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没再正规上过课了。”1968年，刘伟到了升初中的年纪，又赶上复课闹革命。

课虽然是复了，但学习还是断断续续的，不成系统。一直到1973年，中学的基础教育才被再次重视和强调，但这几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提到，整个中学时代的训练都很糟糕，甚至支离破碎。

就在1974年，17岁的刘伟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营部工作。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分了6个师，他在第三师20团5营5连做农业工人，说白了就是在国营农场种地，算上补贴，一个月能挣32元，这在当时算是“挣得不少”。

没过多久，刘伟获得在营部政工口负责宣传的工作，因为平时要帮领导写稿子，所以必须读书看报，掌握最新精神。营部有间资料室，书虽然不多，但都是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名著类的，很好看。因为工作需要，刘伟得到了这间斗室的钥匙。

那是个书荒的年代。年轻人都想看



刘伟与女儿在北大图书馆前放风筝

书，却找不到书，只能彼此换着看、借着看。而拿到资料室的钥匙，意味着刘伟可以随时看里面的书，他用“奢侈”形容当时的感受：“当‘书荒’遇到对知识的渴求，年轻人是珍惜，甚至是饥不择食。”时至今日，刘伟说他依旧喜欢读书，特别爱逛书摊儿，“去触摸这些书，看看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什么，闻闻书香，心旷神怡。”

除了读书，就是玩。18岁的刘伟没想过，也不敢想未来，只是觉得每天过得很热闹，兵团里有很多年纪相仿的伙伴，大家精力旺盛，跑跑跳跳。因为经常要到营部开会，从连部去营部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刘伟只好骑上十几里地自行车往返，但那时的他不觉得累。

“1975年，毛主席要求学‘马恩经典语录’，我记得当时还有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核心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资产阶级的产生。要完成这样的学习，中央开了很多书单，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各地也开始办培训班，兵团当然也得学。记得是‘八一农垦大学’为此办了一个班，我所在的

20团，抽调我和另一个同志去学习。因为时间紧且理解能力有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有些内容的理解可能并不对，但无论如何，开卷有益。”当时的刘伟可能不知道，因为工作带来的学习便利，为他即将获得的一次人生大考创造了机会。

那是个寒冷却孕育希望的深秋，虽然也听说恢复高考的条件并不具备，但刘伟和小伙伴们还是得到了准信：邓小平同志拍板了，高考对他们而言已近在眼前。

“4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当年国家政策这一步走得太对了。否则没有人才，能做成什么事？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决定。”40年，刘伟的人生路已超出了祖辈和父辈的既有轨迹，但在当时，填报志愿难住了他。

“现在，我经常看到很多优秀学生为高考报志愿烦恼。不止一次，我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经历的是甜蜜的烦恼，因为机会太多，你们挑花眼了。我当年的志愿是非常‘理性’的，第一要去大城市读书，这样好找工作；第二最好能去图书馆工作，这样可以看到更多



2000年，刘伟的博导萧灼基先生在演讲

的书。”

赶考赶考，刘伟的大学，还真是被“赶着考的”。

1977年国庆节前夕，刘伟接到参加高考的通知，复习时间只有1个月，没有复习材料，只能是手边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由于黑龙江省参加高考的人太多，所以分了两批考，第一批是11月14日的初考，第二批是12月底的终考。

1978年2月，刘伟接到人生中第一张录取通知书，他看到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普通班本科生”，不是心心念念的北大图书馆系。

“我估计就是没考好，因为准备太仓促了。但可能分数又够了北大招生线，所以把我调到经济系了。”忆当年，刘伟依旧“耿耿于怀”，他随即回忆起这之后的一系列“趣闻”。

“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大学里有经济系。可以理解，对国家来说，当时还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研究不被社会普遍关注，从教学来说，经济学并非显学，给人的感受更多是沉闷。以至于我报考大学时，只知道有政治经济学，而不知道大

学里还有个经济系。”刘伟清楚记得，有人通知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很多伙伴和他一起去拿，拿到之后一看是经济系，“我问他们，经济系是学什么的，没有人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姓陈的北京知青，当时在我们营部的中学教书，他想了半天说，可能是学打算盘的。”说到这里，刘伟笑了起来。

学生是这样的认知，老师教起来，或许就更难了。

在刘伟的记忆里，经济学本科四年他学得非常刻苦，不光是他，整个77级，整个中国，都开始了疯狂学习和追赶。

“有趣的是，大学本科四年下来，我们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甚至外语课也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活页。”或许是机缘，或许是命运，总之刘伟走上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之路。他毕业时，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成为显学，时代成就了刘伟和他的同学们，也赋予了他们新的使命。

从考上北大经济系到从北大常务副校长岗位上调走，刘伟陪伴了北大37年。这段时间里，他从本科到研究生，先后获得了北大经济学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

未名湖畔的往事和挥之不去的情怀

有人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界前前后后涌现出四代经济学家。

按照这一说法，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属于第三代。

身在其中，刘伟所看到和经历的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有两个关键词，叫作“慎独”和“师恩必报”。

在群贤毕至的北大，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瞬间，其实很多。

北大经济学院的张友仁是刘伟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张先生非常注重尊师重道，记得我刚上北大不久，孙冶方先生受北大经济系邀请，为我们作学术报告。孙冶方先生是无锡玉祁人，很早就离家投身革命，但乡音未改，因此他做的报告，我们这些北方学生听着实在吃力。记得当时张友仁先生站在冶方先生身后的讲台上，随着冶方先生的演讲，把难懂的话写在黑板上。那时张先生也已年近60，而且有点发福，又正值盛夏，写几个小时板书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尊重师长的大课。”

刘伟的博士生导师是萧灼基先生。当时在他看来，与老一辈相比，萧先生是中青年一代，曾经是北大经济学院最为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极有才华。改革开放进程中，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者，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

萧先生给刘伟的印象不仅是睿智和才华，更在于他的勤奋。“他曾说过，还在读大学本科时，他就许下两个志

愿：一是在学习上，希望自己能通读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写出《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后来他真的做到了。马恩全集共50卷，累计3200万字，横跨多个学术领域，绵延若干历史时空，能通读下来，没有一股长期坚持的韧劲和对马恩学说的执着，是难以做到的。”刘伟很早就买了“马恩全集”，放在办公室书架上多年，2015年从北大调人大工作，他还嘱咐办公室同志千万要运到人大放好。“但真的没能坐下来系统读，更多的是出于作为资料文献依据的出处查找方便。不能不更佩服萧先生当年的刻苦。”

这些榜样，有的是刘伟的老师，有的是老师的老师，无论身份如何，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求真慎独、经世济民，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从陌生、效仿到自成一家

读书、教书、写书，过去40年，刘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建言者。通过调查研究和笔耕不辍，他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比如关于所有制多种成分的争论。

“承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需要，进而是否承认非公经济本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在刘伟看来，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先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承认个体经济，然后是承认私营经济，再到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直到党的十五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他赞同公有制必须为



2018年6月，刘伟校长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主体，否则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但他不赞同把非公有制经济分割开来、独立出来作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进而与公有制经济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董辅弼先生的‘八宝饭’观点，‘八宝饭’中有米、花生、红枣等，凑在一起是‘八宝饭’，拿出其中任何一种原料都不是‘八宝饭’。”刘伟说。

再比如“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刘伟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首先面对的是怎样迅速摆脱贫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高度关注贫困问题。

贫困本身具有累积效应。从需求端看，由于贫困，人们购买力低，市场需求低，进而对投资者吸引力弱，投资增长慢导致经济发展迟缓，进而新兴部门就业机会增长少，伴随人口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再降低；从供给端看，由于贫困，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水平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弱，投资增长能力弱，则经济增长慢，就业机会增长少，伴随人口增长，同样导致人口收入降

低，更为贫困。这种贫困的循环又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为落后经济培育增长动能？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尽管开展了许多研究，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正统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并未取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摆脱贫困的成就，的确给世界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智慧 and 自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系统总结提炼，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养分。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前后世界银行有关专家对“东亚泡沫”现象作出研究后概括性地提出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但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经济现象还是存在的。

“从现象来说，的确有些国家经济成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越接近高收入发展门槛，其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越严重。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极复杂的，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更有其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答如何克服‘贫



刘伟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先生在北海饮茶抒怀



刘伟与本刊副总编辑陈亮

‘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方案及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回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理论、道路和制度及文化自信。”刘伟说。

40年，为时代、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一直没有离

开课堂的刘伟认为，他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学教学的感受，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陌生。“那时我们不了解经济学，连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了解国际社会经济学的发展是个什么水平了。当然，造成这一状况，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增大，第二阶段是模仿。“在我们发愤图强的过程中，大量国外经济学教材流入我们的学校，教学都照着人家来。虽然模仿也是一种学习，但这种学习多少感觉有点被动，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自信。”

第三阶段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们逐步梳理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科教育的理论自信，用中国的语言和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自信来自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它不是得益于西方理论的成果，而是我们自己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使之再进一步地指导下一步的实践。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过去40年，刘伟的感受同样很深。

“当年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一声春雷、醍醐灌顶。之后40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时代让你敢想、敢于探索和创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焕发起来。可以说，这40年，不是过去任何一个40年能够比拟的。”谈及此，刘伟非常兴奋。

对于全国政协而言，刘伟是“新兵”。

“我是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也是经济界别委员。在这之前，我是北京市政协九、十、十一届委员，北京市政协十、十一届常委，那时我还身兼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分组讨论时，关注点主要是和青年有关的问题。现在我是以经济学者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更多的是要以政协委员身份，从界别角度出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我觉得，这也是社会预期管理的一部分。”履职不到一年，刘伟说他还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

“全国政协是个高端交流平台，大家提出的意见更有综合性和客观性、全局性，这是和其他身份不一样的。比如我现在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除了要求专业性，还要求站在央行角度、维护央行职能发挥的需要。而作为政协委员，我们的视野会很不一样，我会珍惜这个平台。”

话音刚落，秘书就来敲门了。办公室外的会场里，众多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寻求方法论和路线图的莘莘学子，正等着他们的刘老师。

忘年之交 风范长存 ——徐石雪与启功、杨仁恺书信往来

文 / 徐国昱 徐国雍

徐石雪与启功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35年9月8日—15日中国画学研究会第12次成绩展览在北平中山公园董事会餐堂举行，据《石雪斋日记》载，22日“启元白来访，赠画扇一”，54岁的徐石雪时任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早已盛名北京画坛，23岁的启功时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并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从此两代书家密切来往二十余年，成为忘年之交。《石雪斋日记》真实记录了他们君子之交、学者风范的往来足迹：“至启元白谈，送《胆巴碑》一册”（启功自述“二十多岁后，我又得到了一部赵孟頫的《胆巴碑》，非常地喜爱，花了很长的时间临摹它，学习它，书法水平又有了一些进步。”）“元白来谈”“得元伯书”“得启元伯函”“昨晤元伯，属印《赵册》”“送元伯《赵册》二份”“至画会，遇元白、养庵，约茶点”“至元白函，约七月四日观画”“携《董卷》与元白观”“启元白来，阅《林卷》《恽册》”“启元白来还借书又久谈”“启元白来，持《夏太常卷》稿佳画伪，后有张得天题墨竹歌真。出示《夏卷》二、《沈卷》一、《王册》一”“约启元白、韩养痴、汪慎生、吴镜汀、张万里，及梁、沈、褚三女生观书画”“元白来借《星风楼残帖》一册，送其章父所印《唐人书札》一纸”“元白来久谈，为画竹稿并说用笔法，阅临《夏卷》”“启元白

来，久谈治生事”“元白来，持函访邦达”“启元白同印度女士欧辨才来阅画，求画竹一开”“启元白还像板，久谈画兰竹法”“画竹扇并书，为启元白”“为启元白题《紫幢寄庐图》二绝”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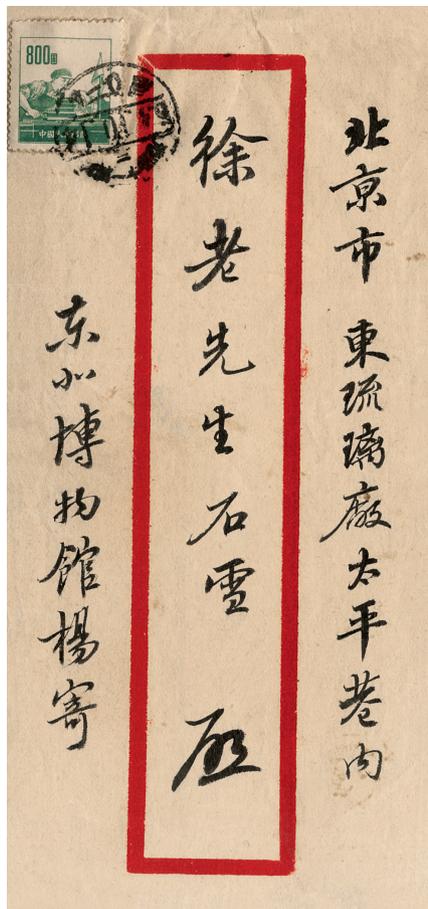
1941年8月，徐石雪筹备中国画学研究会增设书学会，约请好友傅增湘、张伯英、邵章、溥心畲、溥雪斋、郭则沄等书法大家为导师。1941年10月1日《石雪斋日记》记载“至公园书学会开会，到者张勺圃、赵剑秋、罗复堪、陈半丁、郭啸麓、崔云臺、秦仲文、启元白、孙挚哉”，此时29岁的启功已经成为书学会最年轻的骨干成员。

1942年8月17日，中国画学研究会第19次成绩展览在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徐石雪在《石雪斋日记》作了以下评价“此次画展以元白二幅最见进步”，8月19日“至公园，遇元白久谈”。

1947年6月17日“交元白《赵谱序稿》”，6月19日“致元白函，为《赵谱序》事”，6月29日“得启元白函，附稿，又致一行”，12月25日“发元白函（为松雪生卒日，又一律）”。

徐石雪将所著《赵文敏年谱》交与启功诂削正，启功“拜聆教言，获益无量，敢求赐示”。两代书家精研古法、严谨考证、忘年之交的学者风范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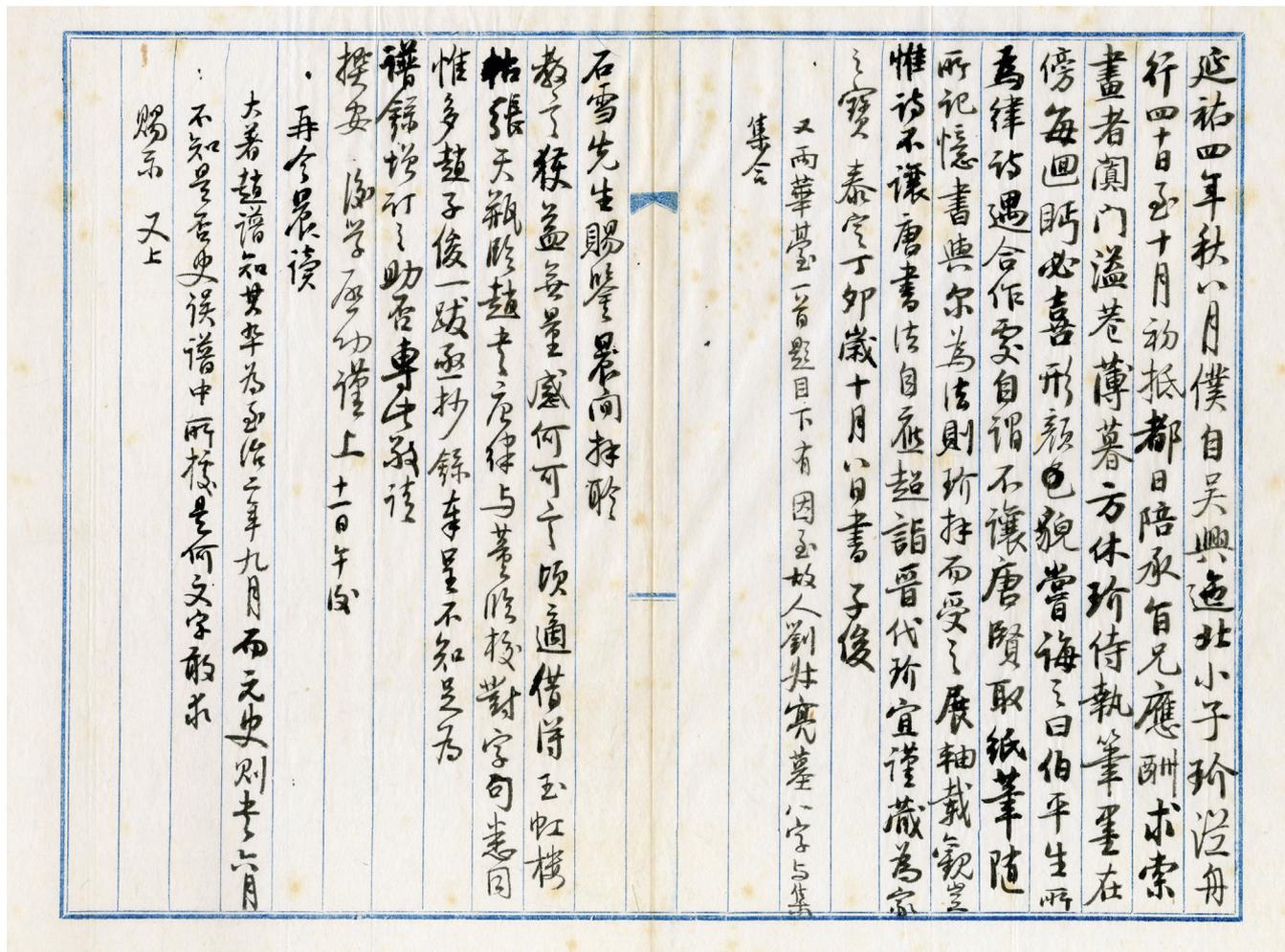
在徐石雪文档中，又见启功具草近作诗稿敬呈石雪先生斧正，在此一



杨仁恺致徐石雪信笺信封

并发表，由此可见启功早年书法与诗文的风采。

徐石雪与杨仁恺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据杨仁恺自述“1945年，只身来到北平，结识了北平的一些文物收藏家和知名书画家。他们经常出示珍藏、彼此切磋，从中一饱眼福。通过看实物，聆听名人指教，用心琢磨，从而积淀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鉴定知识。特别是著名画家徐石雪（宗浩）画竹有独特之妙，书画收藏亦富，鉴赏也别具慧眼，



启功致徐石雪信札释文

石雪先生赐鉴

晨间拜聆教言，获益无量，感何可言。适借得玉虹楼帖《张天瓶临赵书唐律》与《董临校对字句》悉同，惟多赵子俊一跋。亟抄录奉呈，不知是否为谱录增订之助否？专此敬请。撰安

后学启功谨上 十一日午

再今晨读大著《赵谱》，知其卒为至治二年九月。而元史则书六月，不知是否史误？谱中所据是何文字？敢求赐示，又上。

延祐四年秋八月，僕自吴兴迤北小子玠，泛舟行四十日至十月初抵都。日陪承旨兄应酬，求索画者，闾门溢巷，薄暮方休。玠侍执笔墨在傍，每回晒必喜形颜色。尝诲之曰：伯平生所为律诗，遇合作处，自谓不让唐贤。取纸笔随所记忆书与尔，为法则玠拜而受之。展轴载观，惟诗不让唐，书法自应超诣晋代，玠宜谨藏，为家之宝。泰定丁卯岁 十月八日书 子俊

又雨华台一首。题目下有因至故人刘叔亮墓八字与集集合。

经常给以指点。现在能画得一手好竹，乃从徐先生处学得技法，终身服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持着问难质疑、研讨绘事的密切联系。”

1947年11月9日《石雪斋日记》载“宝古同杨君仁恺（川北人）来阅《恽册》、《夏卷》、王、顾二条”，此时徐石雪已经68岁，杨仁恺年仅32岁，后来的《石雪斋日记》展现了徐石雪

与杨仁恺两代学人从相识、相知，到亦师亦友、忘年之交长达十年的点点滴滴：“邦达同杨仁恺、何涤非来阅画”“杨仁恺来诂题《陆治卷》，约饭”“至杨仁恺午饭，观书画”“杨仁恺送《李息斋双钩竹》来求题并还《印本画册》”“杨仁恺来久谈”“杨仁恺来为画竹一枝即补其画竿上”“杨仁恺还《竹卷》一，又借《竹卷》一，

久谈”“仁恺来谈，还《竹卷》，借临《丹丘册》，又《竹册》各一本”“杨仁恺来还《竹册》一，又借《竹卷》二”“仁恺来久谈，阅其藏《沈书盘谷序》真，《文山水》《孙三友图》未佳，《李应祯旧稿》真。阅《完卷卷》”“杨仁恺来辞行送其梅竹一幅”“杨仁恺来久谈，近在东省文化部，索墨竹一幅赠东省博物馆（幽竹寒

石雪先生賜鑒 畧向持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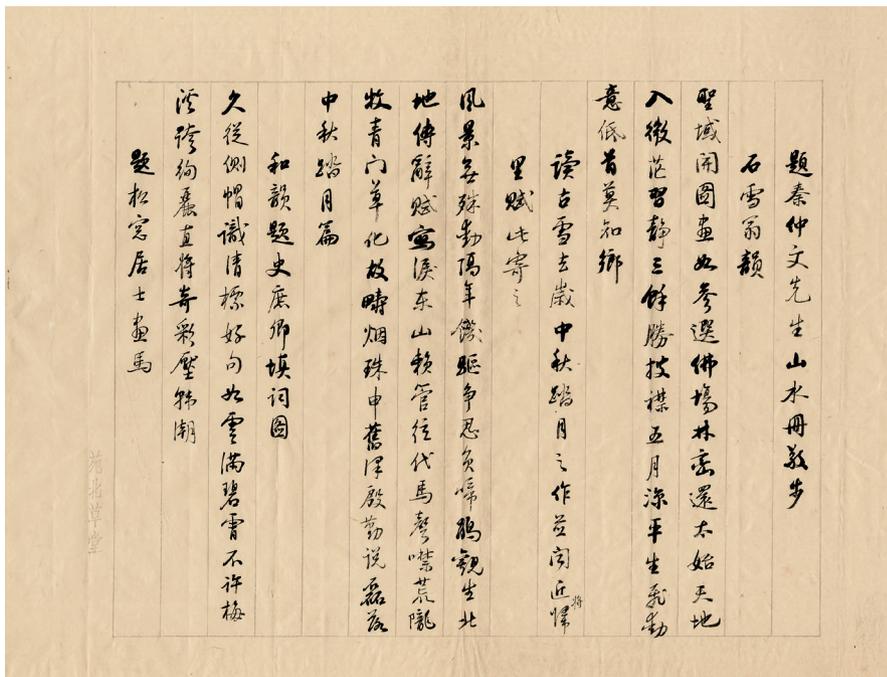
教之獲益無量 感何可了 頃通借得玉虹樓
帖張天瓶臨趙子云唐律與葦修校對字句悉同
惟多趙子俊一跋函抄錄奉呈 不知是為
禱錄增訂之助否 專此致頌

撰安 海學 厚幼謹上 十一日午白

· 再令畧讀

大著趙譜知其率為至治二年九月而元史則考六月
不知是吾史誤譜中所據是何文字敢求

賜示 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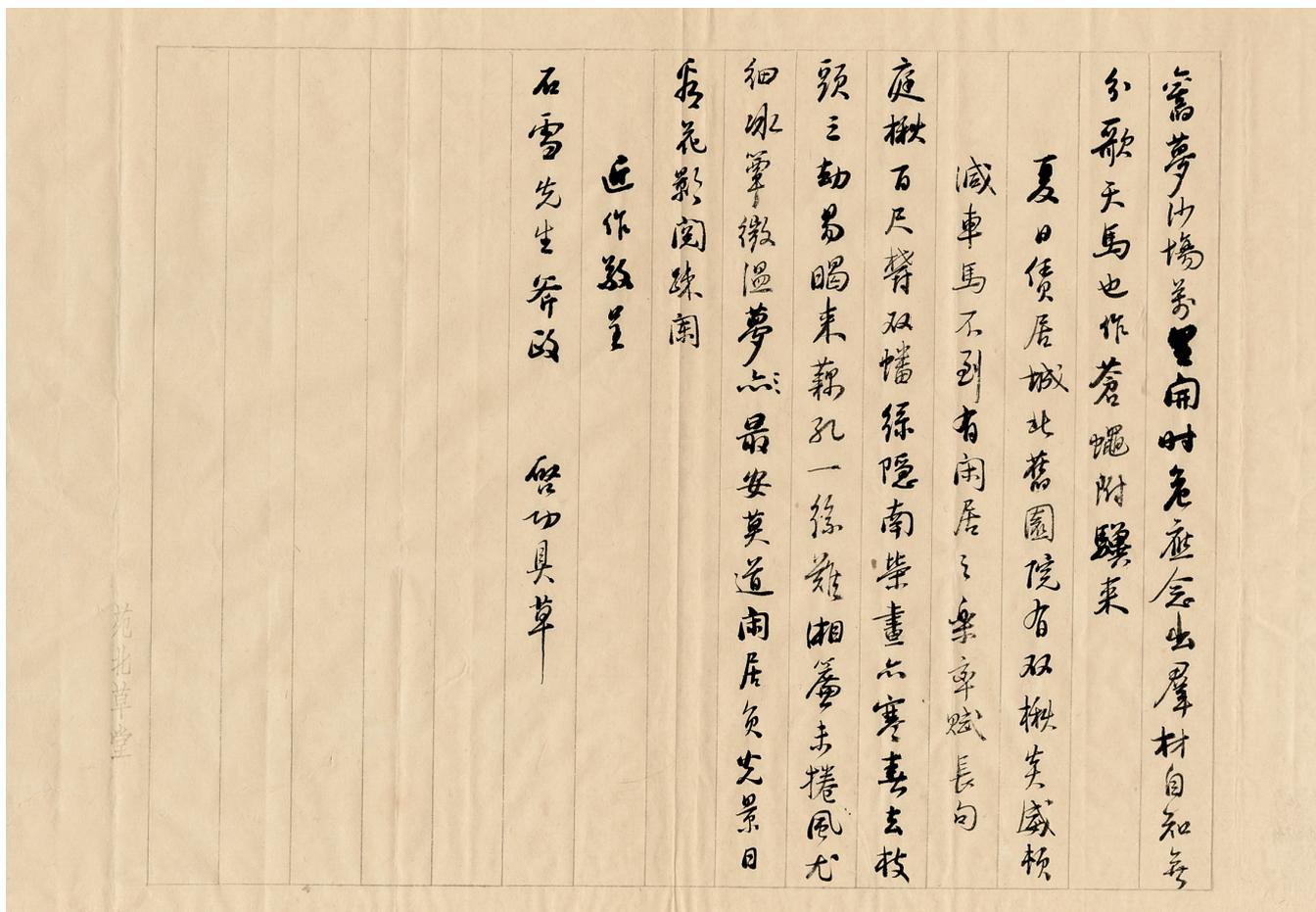


启功随信附寄向徐石雪请教近期创作的诗词

沙) ” “杨仁恺来送东省古艺术展览目录一册” “杨仁恺来谈此次周游各省文化事业” “杨仁恺来久谈书画” “杨仁恺来久谈画竹卷事” “杨仁恺来阅《赵册、卷》各一、《沈衿》《文山水、兰石》《徐墨花》《邹山水》《邢书》二”等等。

1953年9月，一生致力于赵孟頫研究的徐石雪，完成《赵文敏年谱及书画编年录》。同年10月，时在东北博物馆工作的杨仁恺致信徐石雪“将过眼的赵承旨书画，认为真迹的，抄成参考简目，随缄奉上，即请督鉴”。次年9月，又“将赵氏作品见于石渠续编汇钞一纸，附呈督收”，并告“十月后可能去京一行，届时当趋前请益也”，可见其二人交谊之深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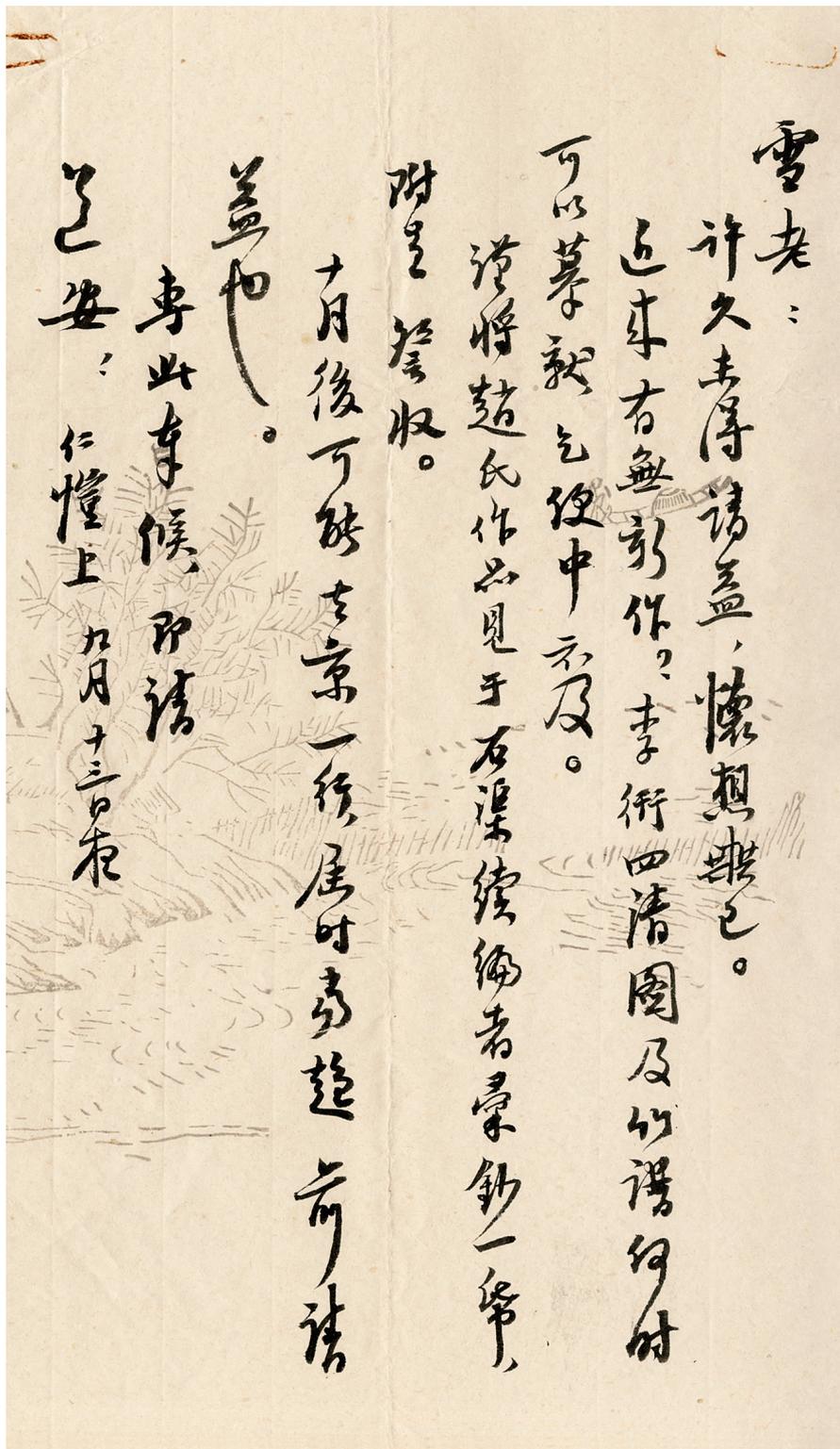
1957年3月27日，杨仁恺为友人拟



借用夏圭《溪山清远图》印本卷子，致信石雪老先生托人来京面交，并“为起居住胜为祝为祷”。当东北美专的李先生叩开杨仁恺经常进出的北京东琉璃厂西太平巷徐宅的大门时，雪老已于两天前染流感溘然长逝，儒雅的小院堆满了名人的花圈挽联。杨仁恺先生亲笔书写的信笺和印有“东北美专”的信封，至今尘封在徐石雪的遗物中。

拂去岁月的风尘，跨越历史的长河，今天，透过这已经微微泛黄的信笺，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前辈徐石雪、启功、杨仁恺对中国书画艺术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执着追求，是不是可以领略到他们忘年之交、问难质疑的治学风范，他们是各自所处时代中华艺坛出类拔萃的大家，先后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何谓大家？其实大家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国粹与精华。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不正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神吗！

要问大家是怎样造就的，就请您从这些珍存书信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吧。



1954年9月13日，杨仁恺致徐石雪信函

雪老：

茲將過眼的趙承旨書畫，認為真蹟，茲將原稿或摹本，攷簡目，隨減車上，即請登鑒。中間可能有漏誤之處，還當指教。幸甚。幸甚。

原報抄寫者，年月的趙氏題識，因近來工作忙，請容許日後有空，再行抄寄。

意中故宮繪畫館當已展出，可前往一看，有不題作品，是以解決中國繪畫發展的問題，若外間所不能輕易見到的。

邦達想必近日更忙，另能晤面，乞為致念。

敬禮！

楊仁愷上

十月十日



1953年10月10日，楊仁愷致徐石雪信函。

“美育之花朵朵开”

——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创新

高琳菲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少年宫, 北京 东城 100010)

【摘要】本文在宏观美育的教育背景下,选择非遗舞蹈作为切入点。论述少儿舞蹈的教学与创作,分析少儿原创舞蹈在非遗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还将探讨非遗舞蹈在青少年舞蹈教育中的创新路径,通过将现代舞蹈编创理念和技术手段相结合,探索如何使传统舞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舞蹈的构思、选材、主题、形象、立意、编排、音乐选择、舞台设计等方面入手,寻找适合少儿表演的创新方式,既保持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

【关键词】舞蹈美育; 传统文化; 非遗舞蹈; 现代性编创

【中图分类号】J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 (2025) 13—035—04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市级中小学体育、艺术、科技类高水平学生社团评审和认定工作的通知》(京教函[2024]410号)的精神,崇文少年宫舞蹈团于2024年12月被评为北京市阳光舞蹈团。该舞蹈团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秉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理念,提升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方针下,不断完善舞蹈团课程体系建设,“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创新”便是其中的一门特色课程。

一、非遗舞蹈的教学

(一)“广东潮汕地区的英歌舞”:是一种融合了武术、戏剧和舞蹈的民间表演艺术,舞蹈特点鲜明,兼具粗犷与细腻,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观赏性。舞者双手持英歌棒,相互敲击或击打地面,节奏铿锵有力,与鼓点儿呼应,气势磅礴。英歌舞融合了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和本地传统,它不仅是娱乐表演,更是团结勇敢的精神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让这种古老的舞蹈艺术形式焕发新生,对于对我们作为舞蹈艺术工作者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二)“藏族地区的背鼓”是西藏地区流传甚广的一种集体舞蹈,它不仅藏族人民庆祝节日、表达喜悦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展示藏族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我利用游戏化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轻松掌握背鼓舞蹈技巧,同时寓教于乐地介绍了藏族背鼓的历史文化背景。采用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多元文化的机会。

针对少儿的特点,教师进行了大胆创新。在保留原有舞蹈动作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元素。例如,通过设置“雅鲁藏布江”的故事情

节来引导孩子完成舞蹈中的各种调度。此外,还特别注重了音乐的选择,力求做到既能体现藏族音乐的独特风格,又能吸引青少年观众的兴趣。参与此次项目的师生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体验。

(三)彝族石屏地区烟盒舞在素材整理的过程中,笔者首先深入云南,走访了滇西地区,在石屏彝族聚居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彝族文化的起源、发展及现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少儿的身心特点,设计了一套既保留花腰彝文化精髓又符合少儿表演特点的动作组合。同时,为了增





强舞蹈的表现力，还融入了海菜腔的声音元素，使整个舞蹈更加生动活泼。这次经历让学生对非遗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激发了他们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感。

二、非遗舞蹈的现代性编创

(一) 原创作品题材的选择

1. 2019年《梦中的鹭鸶》原创舞蹈作品的巧思

(1) 作品以石屏地区的鹭鸶鸟为形象：以彝族非遗烟盒舞的典型素材“鹭鸶伸腿”这一民间动作为素材，探究体态优美、鸣声悦耳、高贵典雅却又无比坚贞的鹭鸶鸟这一典型形象并展开创作。在彝族自治州石屏地区的乡间农田或溪水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鹭鸶洁白的身影点缀着青山绿水，鸟儿长长的脖子时而与身体蜷缩成S形曲线，它们细长的、便于涉水的双脚时而站立，时而飞行，还时而与暴风雨进行猛烈的搏击。鹭鸶这样的夏候鸟，越冬归来，飞行万里，不论严寒酷暑始终相亲相爱不离不弃。我也想借鹭鸶鸟这一象征着长寿、幸福、和平、吉祥寓意的形象来表达我的愿景。

(2) 声与舞的巧妙结合：少儿群舞“梦中的鹭鸶”以彝族烟盒发出的声响作为鸟儿的语言载体，实现与彝族聋

哑女孩进行交流。女孩在梦境中，拿起心爱的烟盒敲出美妙的声响，鹭鸶鸟儿仿佛听到了她的心声，出现在她面前，带领她一起走入了一场梦境般的秘境之旅。一群美丽的鹭鸶鸟围绕着她翩翩起舞，鹭鸶鸟高贵典雅的身影点缀着青山绿水，鸟儿长长的脖子弯曲着，时而步伐轻盈、时而跳跃、时而用烟盒敲击的声音和小女孩对话，嬉戏玩耍。鹭鸶鸟儿陪伴她一起飞舞，把她带到了一个有声的绚烂世界。小女孩幸福美丽的愿望就在这一刻飞向天空，飞向远方！

2. 2021年《鼓舞声声向太阳》原创舞蹈作品的重塑

(1) 作品原型：崇文少年宫原创非遗舞蹈《德吉美朵》，德吉美朵在藏语中是“幸福乐园”，也是“美姑娘”的意思。在2021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线上课程后，因线下排练时间有限，新作品创作周期不足，于是就决定在原作品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造、精进和完善。

(2) 重塑作品：在作品主题立意方面我花了很多心思，最终定下了《鼓舞声声向太阳》这个舞蹈主题。学生像花儿一样的年纪，敲响背鼓，声声震耳，向着北京、向着天安门、向着祖国母亲、向着党的领导，这既是一次舞蹈排演，又是一次很好的爱国思政主题教

育活动。

3. 2025年《巾帼少年行》原创舞蹈作品的呈现

(1) 从传承到创新：

在之前非遗舞蹈的课堂中学生学习了英歌舞的基本动态、动律及风格特点。到作品塑造时，我们想以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为主题，使作品融合传统武术、戏曲身段、非遗英歌舞的文化元素并与科技结合。舞蹈以铿锵的鼓点开场，少年如青松挺立，挥洒出刚劲有力的动作，象征中华文化的根脉与传承；中段融入行云流水般的步伐与舞姿，体现少年在诗书礼乐中的儒雅与智慧；尾声激昂的群舞舞段更是将作品情绪推向高潮，彰显“少年强则国强”小我与大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时代使命感。整支作品刚柔并济，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青春飞扬的现代活力。少年在舞蹈实践中收获了胸怀家国、志存高远的信念。观者能够感受到中华少年如朝阳初升、如利刃出鞘的蓬勃力量。当红衣少年在鼓声中乘势而起，一个民族的未来正在这方舞台璀璨绽放！

(2) 传统文化与科技的结合：

在舞蹈中英歌棒道具的设计和使用上，我们运用了新创意。原始英歌棒多以木材质为主，我们尝试性地使用了可以自

已开关的两用红色发光棒，既可以在小演员的手中耍动，又可以发光。它与舞台灯光配合，时而明亮，时而光灭，使舞台效果丰富多样、变化莫测。作为有新意的创新性表达，它不仅增添了作品效果，还让人印象深刻、引人入胜。

三、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一) 比赛成绩

《梦中的鹭鸶》《鼓舞声声向太阳》《巾帼少年行》这三个非遗舞蹈作品均蝉联了市级阳光艺术节一等奖的好成绩。崇文少年宫的舞蹈在迈向更高更大的舞台时，将秉持以评促建、以赛促学、以评促管、以赛促强、以评促教的理念，实现教学相长。

(二) 学生收获

教师为舞蹈团的每名孩子都建立了成长档案，从学生一点一滴的成长和变化中，学生会有实际获得感。学生在通过舞蹈的学习、表演和创作过程中，不仅是得到了一张获奖证书。更是体验了台前和幕后的许多工种，获得舞蹈相关的职业体验，也在舞蹈比赛中锻炼了自己登台表演的坚韧意志品质。

(三) 未来展望

借非遗舞蹈之力，深耕舞蹈创作，既保留传统舞蹈文化的精髓，又融入时代特色。真正实现非遗舞蹈从“活起来”到“火起来”的转变，让它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崇文少年宫的舞蹈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为我们国家的少儿舞蹈创作贡献一份力量，使非遗舞蹈的创作也可以迈向全球视野。

参考文献：

[1]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人民文学



- 出版社 2021年2月北京第一版
ISBN:9787020165292
- [2] 《舞蹈艺术概论》隆荫培，徐尔充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06月01日
ISBN: 9787805536255
- [3] 《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王玫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09-01

- ISBN:9787552313963506
- [4] 《舞蹈创作心理学》胡尔岩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年11月
ISBN:9787503976056
- [5] 《中国民族舞蹈编创法》徐小平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07月
ISBN:9787566004499

论摄影艺术在展现民族文化风情促进乡村旅游中的作用和意义

边泓瑞

(文化和旅游部海外文化设施建设管理中心, 北京 100005)

【摘要】 本论文旨在深入探讨摄影艺术在展现民族文化艺术风情及促进乡村旅游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通过分析摄影如何记录、传播民族文化, 吸引游客关注, 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与文化内涵, 进而探讨其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等多方面产生的综合效益, 并针对摄影艺术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提出策略与展望。

【关键词】 摄影艺术; 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J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198 (2025) 13—038—04

一、摄影艺术, 宛如一扇通往多元世界的窗, 于瞬间捕捉永恒之光影, 以二维之像承载万象之美与世间情愫

首先, 从技术基石而言, 它是光学原理、器械运用与拍摄技法精妙融合。镜头恰似画师之笔, 光圈、快门则为调控光影的魔法棒。精准对焦、细腻调光, 方能在不同情境下, 如风光旖旎处、人物百态前, 定格清晰锐利、明暗有致的画面, 此为摄影艺术的基本骨架, 赋予影像以写实之基, 令观者可辨其形。其次, 摄影艺术之魅力核心, 在于其独特视角与情感内涵。摄影师能借构图布局引导视线、营造氛围, 或用对称构图显庄重稳定, 以黄金分割勾勒灵动和谐; 亦可通过俯拍展宏阔、仰拍现巍峨。更在按下快门刹那, 注入对世界的感知, 喜悦、悲悯、震撼等情愫皆凝于影像中, 使照片成为情感的扩音器, 跨越时空触动人

心, 让观者与之共鸣, 这才是摄影艺术鲜活的灵魂所在。第三, 摄影艺术是无声的叙事诗、无言的哲思录。它可以记录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挣扎与奋进, 为历史存照; 能将自然之灵秀、都市之繁华幻化成美学符号, 编织成风格各异的视觉画卷; 还能借超现实手法扭曲重构, 启发思维, 成为观念表达的先锋利刃, 拓展着人类想象力与认知的边界, 尽显其在艺术星空中的独特坐标。总之, 摄影艺术是在光与影的画布上绘就的斑斓万象, 是凝固刹那、绵延情感、启迪心智的视觉华章。正因如此, 摄影艺术比其他门类艺术在展现民族风情和促进乡村旅游方面更具巨大优势。

二、摄影艺术在展示民族文化风情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首先, 摄影艺术在民族服饰、建筑、手工艺等物质文化层面的展示具有

独特优势。在文化的浩瀚星空中, 民族建筑、服饰与手工艺宛如璀璨星辰, 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民族的精魂。摄影艺术, 则是那神奇的时光捕捉者, 以独特优势将这些瑰宝定格, 让世界得以透过镜头, 触碰民族文化的温度。

1. 建筑奇观定格: 摄影如神奇画框, 精准裁切出各民族独特建筑风貌。侗族风雨桥横跨溪河, 其木质结构巧夺天工, 摄影师捕捉光影下榫卯的细节、飞檐的神韵, 岁月沉淀的智慧与美学借由照片跨山越海, 向世界彰显民族建筑标识, 为文化研究、风格传承存档。人们还能从古老建筑的布局与装饰中解读民族的家族观念与传承体系。

2. 服饰纹理特写: 镜头聚焦少数民族服饰, 便是开启一场视觉盛宴。苗族服饰的繁复刺绣、绚丽银饰, 在特写镜头下, 丝线的经纬、花纹的寓意、工艺的技法纤毫毕现, 让传统服饰从深山穿戴走向时代秀场, 以影像铭记服饰承载的迁徙、审美等历史密码。

3. 手工艺匠人雕琢: 面对精巧竹编、古朴陶艺等手工艺创作, 摄影化身无声解说员。从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机的经纬穿梭, 到藏族唐卡画师的笔尖勾勒, 一帧帧画面凝固手工匠人的指尖艺术, 定格传统工艺流程, 推动手工艺传承、助力市场拓展。其次, 摄影艺术在



民族节日、习俗、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展示具有独特优势。在多元的人类文明拼图中，民族节日、习俗与宗教信仰是色彩斑斓、意蕴深厚的关键板块。摄影艺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特质，将这些抽象而宏大的文化概念具象化，使之跃然眼前，触动心灵。

1. 民族节日欢腾纪实：如在泼水节的水花狂欢、火把节的烈焰欢歌中，摄影记者抓拍出喜、怒、惊、乐的人群百态。用画面定格瞬间，传递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让节日的活力与凝聚力突破时空限制，感染每一颗心灵。人们还能从传统节日的仪式流程中揭示民族的宇宙观与生命哲学，使摄影作品更能深刻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传递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

2. 习俗传承光影见证：如摄影者跟踪记录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流程、哈尼族梯田农耕习俗，以客观视角展现生活秩序、家族纽带、生态智慧，为后世留存民族习俗的根脉，让传统行为范式在时代变迁浪潮中有迹可循。

3. 宗教信仰肃穆洞察：如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的庄严法会、傣族奘房的静谧佛诞庆典，摄影师心怀敬畏，用光影捕捉建筑内蕴、信徒虔诚之态，展现信仰力量对民族心灵的滋养，为理解宗教文化在民族精神塑造中的深度作用提供窗口。

可见，摄影艺术以其敏锐捕捉、永恒定格之力，在民族文化物质与精神维度穿梭，挖掘、展示、守护风情宝藏，让民族文化瑰宝在时代舞台上熠熠生辉。

另外，摄影艺术对民族文化风情的记录功能是其手段难以替代和比拟的。摄影能够精准定格民族服饰的精美图案、独特的建筑风格、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场景等物质文化元素，以及民族节日的盛大场面，从而精准捕捉民族文化的视觉特征，为民族文化留下直观、真实且极具感染力的影像资料。

三、摄影艺术促进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实现乡村振兴和跨越式发展

摄影艺术将极大地赋能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在乡村振兴的宏大版图中，摄影艺术宛如一条绚丽丝带，串联起民族文化艺术风情与乡村旅游，编织出独具魅力的新时代乡村发展振兴的美丽锦缎。

第一，摄影是乡村绝美旖旎风光的“留影机”。从金黄麦浪翻涌的梯田，到炊烟袅袅升起的古朴村落；从晨曦中雾霭朦胧的山林，到暮色下余晖洒照的溪流，摄影师用镜头捕捉乡村四季轮转、朝晖夕阴的每一瞬惊艳，将那些隐匿在山川湖海间的自然宝藏定格。这些影像通过网络、展览、广播电视等渠道传播，如同一把把钥匙，开启都市人对乡村田园诗意的向往之门，吸引他们背上行囊，奔赴一场与大自然的约会，让乡村的美景从“养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对民族文化艺术风情的传承而言，摄影是忠实的史官。它定格下少数民族传统节庆的欢腾瞬间，像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上骑手的矫健英姿、傣族泼水节的水花飞溅，将仪式、服饰、歌舞等文化细节精准留存。这些影像化作记忆密钥，开启后人追溯民族精神家园之门，让古老技艺、传说在岁月洪流中站稳脚跟，以可视形式延续文化基因。

第二，摄影艺术也是乡村人文故事的“讲述者”。老旧的磨坊、传统的手工艺作坊、热闹的乡间市集，还有那代代相传的民俗节庆，在摄影画面中一一铺展，沉淀着岁月的痕迹与先辈的智慧。照片唤醒人们心底的乡愁记忆，使游客不止于赏景，更能沉浸于乡村独有的文化氛围，探寻古老传承的根系，在心灵深处与乡村完成一场深度对话。同时，乡村旅游因此借力摄影艺术的特有功能实现弯道超车式发展。一方面，绝美风光在镜头下成为“视觉诱饵”，吸

引游客奔赴山海。例如，婺源油菜花田的俯拍全景，晨雾缭绕间黄绿交织，在网络上疯传后，游人如织；另一方面，人文摄影为乡村注入灵魂，游客循迹照片探寻苗寨手工刺绣坊，与匠人交流，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温度，进而延长停留时间、丰富消费场景。

第三，摄影艺术为乡村旅游搭建起创新的“展示台”。以摄影为主题的乡村游线路、摄影创作基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各类乡村摄影大赛，激发了全民的参与热情，作品的二次传播持续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同时，农户在摄影带动下经营起特色民宿、农家乐，售卖农特产品，让乡村旅游产业链在光影的催化下不断延伸，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促使乡村以全新姿态迈向繁荣富足。两者融合碰撞出多元创新火花。摄影展扎根乡村，以田园为展厅，展示民族文化主题作品，既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土壤，又将作品受众拓展至普通游客，有力提升乡村文化品位；“摄影+民俗体验”旅游产品兴起，游客穿上民族服饰、模拟传统劳作拍照留念，在身体力行中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得到升华，乡村旅游从观光迈向深度体验，开辟增收新径，为民族文化遗产、乡村发展注入澎湃动力。由此可见，摄影能够很好地带动旅游产业发展，对乡村旅游产业各环节都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它可促进旅游人数的增加、旅游消费的提升，促使旅游相关产业如餐饮、住宿、交通、购物等的协同发展，通过吸引游客流量，为乡村旅游经济注入活力，促进乡村经济繁荣，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乡村地区的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摄影艺术本身在乡村旅游中创造了更多附加价值。例如，摄影作品的版权销售、以摄影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及文创产品的开发、摄影旅游线路的策划



与运营等，这些基于摄影艺术衍生出的经济活动不仅为乡村旅游带来了额外的收益，还丰富了乡村旅游的产业形态，拓展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第五，摄影艺术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记录民族文化风情的影像资料，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生动、翔实的教材。这些摄影作品能够在年轻一代中激发起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促进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延续；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有助于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价值，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保护策略。

第六，摄影艺术可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促进乡村民族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与传播。优秀的摄影作品能够在国内外的摄影展览、文化交流活动、网络平台等渠道广泛展示，使更多人了解乡村地区的民族文化魅力，增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提升乡村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七，摄影艺术在乡村内部将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对乡村民族文化艺术风情的摄影展示，能够唤起当地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摄影活动的开展也为乡村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参与文化建设的平台，丰富了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第八，摄影艺术能很好地促进城乡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乡村旅游因摄影艺术的宣传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前往，城市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不仅带来了经济收入，还带来了城市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和信息资源。这种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文化交流与资源共享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更加均衡、和谐的社会结构。

四、对今后摄影艺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首先，要大力培养专业摄影人才尤其是本土人才。可在乡村地区开展摄影培训课程与工作坊，发掘和培养具有潜力的本土摄影人才。这些本土摄影人才熟悉当地民族文化风情与乡村旅游资源，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拍摄出富有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的作品，为乡村旅游宣传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摄影素材，同时能带动当地摄影文化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摄影创作群体。可构建引进外部专业摄影人才与乡村旅游机构、当地摄影爱好者进行合作的模式，建立人才引进与合作的长效机制。外部摄影人才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先进的摄影技术与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的加入能够为乡村摄影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创意，提升乡村摄影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市场竞争力。通过合作项目、摄影创作交流活动等形式，促进内外摄影人才之间的知识共享与技能提升，共同推动乡村摄影艺术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次，可根据自身条件构建摄影展示平台。加强线下展示空间建

设。建议在乡村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乡村文化广场等场所设置摄影展厅、摄影画廊等线下展示空间。定期举办以民族文化风情为主题的摄影展览，展示当地优秀摄影作品及国内外知名摄影师拍摄的乡村题材作品，为游客提供一个集中欣赏乡村摄影艺术的场所，同时使其成为乡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窗口。此外，在乡村旅游线路沿线设置摄影打卡点，将摄影展示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吸引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增加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停留时间与消费机会。最后，要加强线上数字平台打造。要高度重视构建乡村旅游摄影的线上数字平台的建设。可开发专门的乡村旅游摄影网站与手机应用程序，整合乡村旅游资源信息、摄影作品展示、旅游攻略分享、摄影比赛活动等功于一体。通过线上平台，游客可以随时随地浏览乡村摄影作品，了解乡村旅游资讯，参与摄影互动活动；旅游从业者可以利用线上平台进行旅游产品推广与营销。我们正站在“视觉重构乡村”的历史交汇点，让每一次按下的快门既是审美的雕刻刀，更是文化传承之舟的锚点，让影像之力推动传统乡土在新时代的文化河流中永远奔腾前行。总之，摄影艺术在展现民族文化艺术风情、发挥摄影记录功能、传播民族文化、吸引游客关注、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与文化艺术内涵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其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与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等多方面都将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